

102
131

理论与实践

LIILUN YU SHIJIAN



8

一九五八年八月

目 录

斥現代修正主义对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詭辯	孙 孺(1)
实践出哲学	楊 樾(7)
論教育为政治服务和教育与劳动相結合的方針	龙世雄(12)
資产階級民族学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	黃朝中(16)
必須在广东少数民族調查工作中插上紅旗	賴才清(19)
中东局势縱橫談	陈仲达(22)
銳利的武器——介紹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	村 人(26)
阿拉伯人民的誓言	蕭明父(29)
最拙劣的魔术师	于燕郊(30)
“中游”与悬崖	希 梁(31)
巧妇可以作无米之炊嗎？(从讀者中来)	胡子华(32)
关于現代修正主义的几个問題(問題解答)	(33)
中东石油与帝国主义对中东的武裝干涉(資料)	上 維(34)
乐东县番陽乡黎族合畝制(生产关系部份)調查	广东省少数民族 社会历史情况調查組(37)

动 态

广州市第一个工人哲学小組成立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招考研究生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工作大跃进
苏联专家波伐良也夫来穗講学

論 著

斥現代修正主义 对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詭辯

孙 孺

以铁托反动领导集团为代表的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现在已經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了它的真面目：铁托反动领导集团不过是帝国主义所收买了的、披着馬列主义外衣冒充“外婆”的一只豺狼。作为现代修正主义的集中表现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是帝国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用以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陣营国家之間的团结；瓦解国际工人运动斗争力量，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的罪恶工具。为了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保卫国际工人运动的胜利发展，必須从政治上理論上揭穿现代修正主义在“社会主义”羊头的幌子下出卖的资本主义狗肉的实质。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間，各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間的一场严重斗争。这个斗争必須繼續进行到底。正如我們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決議所指出：“在政治上和理論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統一，是我們党对国际工人阶级的神圣义务”。

作为现代修正主义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在一系列的根本問題上，公然背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是一个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綱領。人民日报社論指出：“这个綱領草案在思想方法上是用詭辯代替革命的唯物辯証法；在政治上是用反动的超阶级的

国家論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論，用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替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政治經濟学上是为壟断資本辯护，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本文的目的，是仅就政治經濟学方面，駁斥现代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中现代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詭辯。

南共綱領草案怎样为现代国家壟断資本主义辯护呢？如果把綱領草案关于这一部分的論点“譯成人类普通的語言”（列宁語）的話，就是：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結構起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国家資本主义傾向的加强”。这种国家資本主义趋向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机构的性质和作用已因而发生了变化，它已經是“劳动关系和财产关系、社会权利和社会服务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調节者”；它正在日益“限制私人資本作用”和“剥夺私人資本所有者在經濟和社会中的某些独立职能”；它“通过限制管理私人資本权限和监督利潤分配”，可以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納入計劃經濟的因素”，甚至可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因而这种国家資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客观的发展过程使社会主义的社会經濟前提和因素得到加强和发展，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客观上日漸靠近社会主义”。因而工人阶级只要对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不断加强压力”，争取在这种国家机构中“取得决定性的影响”，用不到以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也用不

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道路进入“社会主义”。①

这就是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铁托领导集团所表达的“对当代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某些最根本的问题的原则性见解”。只要稍为具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得出，南共纲领草案是如何地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和关于现代国家垄断资本的原理，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现在，从下面几方面来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谬论。

一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本质

在帝国主义时期，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各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现象。这种现象是以所谓国家调整经济的形式出现。这种现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在两次大战期间得到了发展，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迅速发展起来。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修正主义者出来为垄断资本辩护，把这种现象的发生，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意味着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成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消灭了，资本主义变成某种“国家社会主义”了。在目前，以铁托领导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则进一步把它说成：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倾向的加强”，“就其客观趋向来说是社会主义因素”。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些谬论都是在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进行诡辩。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是“表示奴仆式的卑鄙迎合态度”。列宁曾经严正地愤慨地揭穿了资产阶级奴仆的这种种臆造，并揭露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非常加速并加快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与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组合日益密切地溶合起来，它所加在劳动群众身上的骇人听闻的压迫，也就愈益骇人听闻了。”②在这一点上，不论是过去第二国际的叛徒们或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们，都是从掩盖国家的阶级性，掩盖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在帝国主义的条

件下，帝国主义的国家政权机构是从属于垄断巨头，为一小撮垄断巨头服务而对广大人民实行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社会分裂成为敌对的阶级以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镇压被统治阶级，才使用起国家这个工具来。所以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凡是阶级矛盾在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限度内，便产生国家。倒转来说：国家之存在，就证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③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认为：谁把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手里，谁也就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把政权的主要杠杆掌握在自己手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主要掌握在垄断资本家集团手里，他们也就掌握了政权。我们的分析必须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出发。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垄断组织和银行垄断组织的发展，使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溶合起来，混合生长起来，结果产生了财政资本。财政资本的形成，使生产和资本更迅速的积聚和集中，就使经济命脉集中在一小撮工业和金融巨头——财政寡头的手中。在经济上确立了统治地位的财政寡头，随着它的横霸势力日益扩大，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入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因而也确立它在政治领域的统治地位。这样就使垄断组织同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在前者具有决定和指挥作用的条件下密切地溶合起来，使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从属于垄断组织，成为财政寡头发财致富的工具，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为一个置千百万人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中的机器。”现代修正主义者极力掩盖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阶级性，企图证明资产阶级国家有自己的什么独立的职能，是超阶级的东西。说资产阶级国家“在承担起重大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国家机关也获得其独立的经济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国家机器的社会作用。”说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社会职能，既可限制工人阶级也可以限制私人资本。完全别有用心地企图抹煞资产阶级国家完全从属于垄断组织，它的作用只是维护垄断

① 引号内的文句是引自“南共纲领修正草案”，以下无说明出处的均同。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62页。

③ 同上书，第165页。

资本的**利益和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落后国家的人民的事实。**

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从属于垄断组织并被利用为垄断组织**增殖利润的工具，是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现代垄断资本已经不满足于获取平均利润，而是以**获得垄断高额利润即最大限度利润为目的。**

垄断资本家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利润的源泉，在许多方面非进一步运用国家机构不可。它大致采取下面的一些重要的方法：

首先是用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方法。这种剥削的加重，一方面是通过垄断组织对企业中的工人阶级实施劳动军事化、提高劳动强度、采用新技术等办法来达到的。结果是对工人的剥削率惊人地增大，以美国的情况来看，美国工人的剥削率在1899年为128%，而到1950年则已达到253%，在半世纪中几乎增加了一倍。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作为消费者和纳税人受着垄断资本集团的**额外剥削。**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垄断组织在国内用垄断价格，即用高于生产价格非常多的价格在国内出卖自己的商品。为了维持国内的垄断价格，就利用国家政权对外国进口货课以高税。在美国，对于被认为会同美国货“竞争”的进口货，是根据这种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售价来定关税的。另一个方法是垄断组织把“剩余的”——就维持垄断价格来说——商品运到国外市场去倾销。在美国，倾销的主要办法是利用国家机构贷款给各资本主义各国，这些债务国就不得不按照贷款的条件把借到钱在美国向美国垄断组织以高价购买其“剩余的”商品。同时，垄断组织通过国家定货来实行军事生产，从而获得巨大的利润。这些贷款和军事定货都是通过国家的预算，用向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榨取愈来愈多的赋税来支付的。从美国的赋税增长情况看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1915—1916年度，美国联邦预算的赋税收入为7.08亿美元，而到1952—1953年度惊人地增加到626.56亿美元，即增加87倍多。①这些赋税主要是从劳动人民的劳动收入中吸取来的。例如美国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工人是不纳所得税的，战后，每个年收入4,000美元的工人所缴纳的所得税，在1952年就达357元至799元，即达他们年收入的9%到20%。但这4,000美元收入是不足维持一个不大的家庭的最低生活费的。在英国也同样，波立特曾写道：“一个每周收入五英镑的工人每周所缴纳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就将近1.5英镑。”②目前，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直接税和间

接税，**耗资工人工资达30%。**这些赋税都被用种种办法转入垄断组织的腰包的事实，就连美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得不作出这样的供认：“现在主要问题在于，近年来联邦政府在强大的私人公司压力之下，……已经有意地或者无意地运用这些主权（指税收和支付的主权——引者）来促进私人垄断，……用来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剥削多数人。”③现代修正主义者却在为垄断资本辩护说：“国家把经济中的重大作用夺取过来”以后，同时在“工人阶级自觉和自发的压力”下，竟可以通过税收制来“调节经济生活”。好象是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生活”。这不是骗人的鬼话吗？南共纲领完全无视上述事实，他们比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表现得更加虚伪。

其次，垄断组织加重对基本农民群众的剥削也是最大限度利润的源泉。垄断组织一方面按垄断高额价格将商品卖给农民，一方面按非常低的价格——垄断低额收购价格——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垄断组织又以债务来束缚农民，然后用极低的价格把农民的土地和财产攫为己有。垄断组织的这种掠夺行为是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法律所保护的，是通过国家机构的警察、监狱来实现的。绝不是如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职能”，具有“限制私人资本的权力。”

再次，垄断组织通过国家机构来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的人民，是保证最大限度利润的重要源泉。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维克托·佩洛的统计：1948年美国垄断组织用各种手段在国外获得了75亿美元的利润，其中国外投资的利润为19亿美元，用高额价格出卖商品的利润为25亿美元，用低额垄断价格收购商品的利润为12亿美元，运输、保险等利润为19亿美元。而这个总额则几乎达到美国公司全部利润的25%。为了保护垄断资本家的钱包，他们还不惜对这些国家和人民进行武装侵略。例如1956年，英法帝国主义就为了他们在苏伊士运河和中东石油的利益而出兵侵略埃及，最近美英帝国主义也为他们中东的石油利益而武装侵略黎巴嫩和约旦，企图镇压中东阿拉伯人民的民

① 材料引自库兹敏诺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版，第34页。

② 材料引自瓦尔加：“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50页和246页。

③ 美国瓦尔特·亚当斯，荷拉斯·格雷合著：“美国政府是垄断势力的扶植者”，三联出版社版，第77—78页。

族解放运动。这是壟断巨头使国家机构从属于壟断組織并使之为其服务的最明显的事实。

壟断财政寡头掌握国家政权的形式，是随着壟断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初期的收买政府的代表参加壟断組織的董事会、监事会进而派遣自己的代理人钻进国家机构。“美国六十家族”的作者兰德堡就供认出：美国总统照例总是一小撮壟断資本家的傀儡和直接工具，誰不得到統治家族的同意就休想走进白宫。他还举出了美国历届的总统都是各个壟断集团的代理人。随着壟断的发展使資本主义內部矛盾进一步的尖锐化，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进一步瓦解和崩毀、資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的加深，壟断巨头就发展到由自己亲身钻进国家机构来更直接掌握政权，这种情况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都非常突出。我們只以美国艾森豪威尔1953年成立的內閣来看，更是赤裸裸地暴露出了壟断巨头直接控制国家权力的事实：国务卿杜勒斯本身是属于洛克菲爾集团的大資本家；国防部长威尔逊是杜邦集团通用汽車公司的總經理；陸軍部长史蒂文斯是摩根集团的联邦銀行的董事长；海軍部长罗伯特·安德生本人是克薩斯州的百万富翁；財政部长汉弗莱是克利夫兰財团的代表；副总统尼克松则是基安尼尼集团的代表。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到現代资产階級国家政权是怎样和壟断集团融合为一的。

从上述分析和历史的发展証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壟断資本主义原理的完全正确性。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壟断发展的必然結果和最高阶段。在壟断組織具有决定和指揮作用的条件下，和国家机构溶合为一，并使国家机构从属于壟断組織，以国家壟断的形式出現，使国家机构成为其获得最大限度利潤的工具，是現代資本主义基本經濟規律的作用所必然引起的結果。这就是国家壟断資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实质。南斯拉夫的現代修正主义者却力图掩盖国家壟断資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和物質的基础，掩盖资产階級国家机构是从属于壟断資本集团，是壟断資本集团用为統治劳动人民、攫取最大限度利潤的性质。說什么“国家資本主义不是資本主义的某一个特殊阶段”，只是“壟断資本主义在經濟上政治上已招架不住”而“自发”的“一种傾向”。把目前帝国主义的政权說成并不是壟断組織专政的工具，說什么“国家不再是資本主义社会某一階級的机构了，它不再反映和維護这一階級的特殊利益了”（尔·伊：“資本主义变化了嗎”）。把资产階級国家机构說成是超階級的，因而为国家壟断資本主义辯护

說：“国家資本主义关系的特殊形式可以是資本主义保全自己的最后努力，也可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也可以同时既是前者也是后者。”我們看看，現代修正主义者为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实质的辯护是如何无耻地在臆造，以至无法自圓其說到了語无倫次的地步。

二 帝国主义国家調整經濟的实质

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进一步企图掩盖壟断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机构来加强壟断的国家調整經濟形式的实质。說什么“国家干涉社会經濟发展的傾向日益加强”，“并剝夺私人資本所有者在經濟和社会中的某些独立职能”。說什么“通过发展信貸制度和利用稅收制度調节經濟生活，或通过直接措施即把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門国有化和投以巨量的国家投資，或是，最后，通过限制管理私人資本权限和监督利潤分配，納入計劃經濟的因素。而通常是通过上述各項措施的結合，国家把經濟中的重大作用夺取过来”。因而“国家作为劳动关系和财产关系、社会权利和社会服务以及其它社会关系的調节者的作用也得到加强”。其結果据說是，“……客观发展的过程，使社会主义的社会經濟前提和因素得到加强和发展”，最后，竟至“使現代資本主义社会在客观上日益靠近社会主义”了。在这种論断中，已經看不到絲毫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迹了。

現代資本主义国家在稅收制度上的所謂調整經濟生活的实质，是加强对工人階級及全体劳动人民的額外剝削的手段。它的調整是不断增加劳动人民的賦稅。以美国的情况来看，本文前节所举的实例中已可以看出。在战后，美国实行了降低起征点和增加賦稅額的办法調节稅收的，根据美国的統計材料，自1940—41年度起，对单身汉收所得稅的起征点是从年收入1,000美元起，对无需活养他人的夫妇的起征点是2,000美元。一个年收入2,000美元的单身汉，所得稅額从1939年的32美元增至1944—45年的345美元；年收入3,000美元的无需养活他人的夫妇，在同期間稅額从8美元增至475美元。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工人所繳納的所得稅达工資收入的18%，起征点从1938年的年收入1,200日元，到战争末期降至600日元。使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在高額賦稅下呻吟，过着飢餓的日子。

至于現代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所謂調整經濟的重要形式的国有化問題，列宁早就指出了它的实质：是由国家負責来挽救将近破产的私人工业提高并担

保其收入的一种手段。絕不如南共綱領所說的：国家資本主义“客觀的发展过程使社会主义的經濟前提和因素得到加强和发展，使現代資本主义社会在客觀上日漸靠近社会主义。”

资产階級国家国有化企业的来源大致从以下两方面：

(一)是私人壟断資本不愿意投資的企业，由国家的預算来建設，因而通过国家的預算来投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美国在建設和扩大制造业上共耗費了国家資金 171 亿美元。壟断資本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1.取得了国家发行公債的穩当的利息；2.从建設工厂的工程中获得巨大的利潤；3.国家的工厂在战时由国家无偿地交給壟断資本經營；4.战争结束后，壟断資本用最低的价格购买了这些工厂，购买价格通常是等于原来投資額10%左右。美国战时资产管理局在它的一个报告中也不能不承認，到1946年6月，250家最大制造业公司购买了这些国有企业财产的70%，这些公司在战时却經營着属于国家的而由私人管理的新工厂總額的79%。①

(二)通过国家的財政預算，将个别設備陈旧，处于破落不能維持的境地的私人企业，用贖买的办法将它变为国有化企业，而贖买的价格则是异常丰厚的。例如，曾經为资产階級的奴仆們大吹大雷地描写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英国国有化情况，实际是怎样的呢？私人壟断資本将他们陈旧不堪的、破烂的煤矿、煤汽、电力企业、铁路、运河等运输企业、英格兰銀行、电报及国外无线电联系企业、黑色冶金业……等轉給国家，而从中获得了将近28亿英磅的补偿，这些补偿是大大超过这些企业現有的价值的。私人資本通过这种轉变，把手中不稳定的股票換成了收入穩定的国家有价証券。同时，这些收归国有的企业，全部管理大权都还操在壟断資本家的手中。

这样的国有化給工人階級带来了什么呢？是通过国家政权实施增加劳动强度、禁止罢工、冻结工資。所有资产階級国家的国有化并没有也不可能廢除資本主义的剝削关系，国有化企业中的工人只是被集体的資本家变本加厉地剝削着。这就是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国有化的实质。

国家壟断資本主义通过国家所謂調整經濟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国家定貨。为了解救私人壟断資本銷售困难的危机，实行国民經濟軍事化，用国家的預算来对壟断資本給予巨額的軍事定貨。据美国軍事生产局的統計，在1940年到1944年9月間，国家

和18,539家公司签订了价值1,750亿美元的軍事定貨，其中最大的33家公司即获得了全部定貨的一半以上，而其中最大的十家又占了30%。在侵朝战争时期国防訂貨的集中情形还要大，最大的50家公司得到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国防訂貨款額，而最大的10家公司得到總額达40%。②壟断集团从这里获得了巨大的利潤。

此外，资产階級国家的所謂調节生产，是在壟断資本生产的商品有銷售困难时，通过国家来縮减生产。例如美国由于农业生产过剩——就市場供求來說——，小麦的种植面积就由1948—1952年的2,700万公頃，縮减到1957年的1,700万公頃，产量由3,100万公吨降为2,100万公吨。今年以来，工业生产也急剧的縮减。这样調整的結果是工人工作时数减少，失业工人增加。目前美国工人失业和半失业的数目已达1,800万人，工人階級的生活急剧地貧困化。

从上述事实說明，资产階級国家机构調整經濟的实质，只是资产階級国家机构从属于壟断組織，为挽救壟断組織的破产，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剝削，为保持它們获得最大限度利潤的手段。它根本没有动摇到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現代修正主义者所說的，現代資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資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根本是胡說八道！

三 国家壟断資本主义不可能和平長入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一步替帝国主义主子卖力，从第二国际的叛徒們的旧倉庫里拿出了一套旧商品来販賣。就是“和平長入社会主义論”。南共綱領修正草案說：“資本主义世界蓬勃发展的国家資本主义趋势极其明显地証明：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徑不可阻擋地深深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当代人类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在这里，現代修正主义者首先企图剝割列宁关于国家資本主义的理論，混淆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混淆在資本主义国家中的国

① 美国瓦尔特·亚当斯、荷拉斯、柯雷合著，“美国政府是壟断势力的扶植者”三联出版社版第127頁。

② 同上书第107頁。

家壟斷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的國家里所實行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的根本不同性質的區別。

列寧強調地指出：“在政權屬於資本的社會裏面的國家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國家裏面的國家資本主義，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國家資本主義是表示，它為國家所承認，並受國家監督，以擁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國家裏面，是同樣的做法，但是為着工人階級的利益，目的在抵抗依然強大的資產階級，並與之鬥爭”^①又說：“（無產階級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我們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活動範圍的資本主義，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同國家聯繫着的，而國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進部分，就是先鋒隊，就是我們”。^②問題非常明顯，這兩種不同條件下的不同性質的國家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區別在於誰掌握政權。在壟斷資本掌握政權的條件下，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意味着壟斷組織通過國家政權加強壟斷，是証保最大限度利潤的手段，這樣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首先它還是資本主義，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工人依然是被剝削階級。因此，這種經濟性質不含有任何社會主義的因素。

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裏面的國家資本主義，則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另外一回事。例如蘇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所提出的國家資本主義，是過渡時期在經濟上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為了進一步消滅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社會主義的一種特殊的政策。它是在工人階級的國家監督之下的資本主義，目的在於不斷發展和擴大社會主義經濟成份，不斷排斥和減少資本主義成份，最後變國家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因而它是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我國在過渡時期對資本主義經濟改造所採取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也是在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的條件下，黨中央和毛主席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創造性地運用於中國具體情況的政策，在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與資本主義經濟從外部的聯繫逐步進到內部聯繫，最後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

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一方面混淆這兩者之間的根本不同的性質，但另一方面卻有一種奇怪的邏輯：它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稱贊不絕，美化為“社會主義因素”，但是當談到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經濟時，卻深惡痛絕地說成是“國家資本主義”，是“官僚主義和國家極權主義的傾向。”更無恥的是抹煞了社會主義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說什麼“近幾十年來馬克思主義思想落后於現代社會的發展了。”把社會主義各國在堅持馬克思列寧

主義原則而取得的成就，一概稱之為“實用主義的修正。”在這種顛倒黑白的謊言中，鐵托領導集團為了報答美帝國主義十幾億美元的獎金而頌揚帝國主義和攻擊社會主義的叛徒嘴臉不就昭然若揭了嗎？

不錯，列寧曾經說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備的物質準備，是進入社會主義的門階。”非常明顯，列寧所指的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是無產階級經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奪取政權以後；用來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絕不是如現代修正主義者所說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就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所謂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國家資本主義具有“社會主義因素”，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包含有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的萌芽，這是完全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的。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的生長和其他社會制度的生產關係生長不同，它不可能在舊的社會制度中萌芽，就是說，資本主義制度中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必須在工人階級奪取了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後，才有可能在“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恩格斯早就指出：“資本主義迫使巨大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日益轉變為國有財產，因此它自己指出了完成這一革命的途徑。無產階級將奪取政權，而把生產資料首先變為國家的財產。”^③現代修正主義的論斷，是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原理毫無共同之點的。

鐵托領導集團的綱領草案本身，暴露了他們的欲蓋彌彰的罪惡目的，那就是企圖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已經是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只要在資產階級的政權中“取得決定性的影響，”就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了。而得出這樣的結論，正是為了麻痹工人階級革命鬥爭意志，企圖取消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來為他的帝國主義主子延續它不可避免的滅亡的命運。全世界的工人階級的政党和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有義務起來揭穿鐵托領導集團在帝國主義指使下的這種惡毒的陰謀。堅決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以保證國際工人運動的勝利發展！

一九五八年七月卅一日

① “列寧文集”第七冊，人民出版社版第200頁。

② “列寧全集”3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4頁。

③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版第294頁。

实践出哲学

楊 械

一

哲学是一种科学。而任何科学，都不是什么神秘的、高不可攀的东西。真正的科学，說穿了只不过是人們在自然斗争或阶级斗争实践中的科学反映；它从实际斗争中来，又回到实际斗争中去。如果要說哲学有什么特別的話，那就是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学，只是关于自然现象和自然的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又不同于社会科学，只是关于社会现象和社会的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而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認識的变化、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的科学。

哲学既然是这样一門科学，那就可以肯定：第一，哪里有实践，哪里就有哲学；第二，从哲学出現的时刻开始，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陣营，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人們在实践中，或者是遵循着唯物主义，或者是遵循着唯心主义；只不过有些人是自觉的，而有些人却是不自觉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它具有鮮明的阶级性和战斗性。这就是辯証唯物主义和唯物辯証法。各种流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冒牌的科学，是一种混淆黑白、顛倒是非的詭辯。因此，哲学又是阶级、政党的世界觀。

这样的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觀，时时刻刻都在人們的生活实践、工作实践、斗争实践中反映和表现出来，就好象影之随形。大至貫徹党的总路綫、各項方針政策和领导者的领导方法，小至处理个人的日常工作（生产）、待人接物和生活問題，无处不反映和表现人們的哲学思想。很难設想一个有正常思想活动的人可以和哲学无关的。既然所有这一切

都是客观存在的，既然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同哲学打交道，都在从事这样或那样的实践，那又为什么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那么高不可攀呢？

我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用自己的勤劳和勇敢創造世界的奇迹的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人人都可以成为哲学家，都应该学会自觉地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觀——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包括主觀世界）的理論武器。这样，我們就有可能更自觉地貫徹“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更正确地处理工作、学习和生活問題。

二

我們的时代，是哲学的时代，我們的国家，也将成为哲学的国家。現在，在工厂，在农村，在学校，在国家机关，在大街和小巷，只要那里出現着工作（生产）、学习、生活的大跃进，那里就显示出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巨大威力。

唯物辯証法的基本規律之一，是对立的統一和斗争。这在貫徹总路綫的实践过程中得到反映。是力爭上游，还是甘居中游，是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費，这是两个互相关联着的对立面，即矛盾的斗争。对立面被克服了，矛盾被解决了，总路綫的精神得到貫徹，思想和工作就向前跃进；事物的发展，又必然出現新的对立面，即新的矛盾，經過了斗争，又被克服，又被解决，思想和工作又从跃进再跃进。只要人們掌握了事物发展的这一客观規律，就能够不断革命，不断前进。同时，这里的一“上”一“中”，一“多”一“少”，不仅是量的变化，同时是质的变化。从“中”到“上”，实质上是从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到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是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轉变，是从量变到质

变。这样，在表明事物发展的对立的统一和斗争同时，也反映了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规律。

这里所反映和表现的正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问题。

已经是尽人皆知的“马鞍形”问题，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哲学无关，有些人也从来没有把它当作哲学问题。其实这里面大有哲学。

且不說从“马鞍形”所反映的跃进——保守（反“冒进”）——大跃进的统一和斗争，只就思想方法论方面来看，也很有值得接受的教训。

有一些犯过反“冒进”的错误的同志，往往把自己的右倾保守思想当作是“实事求是”。然而，他们是形而上学地理解“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们要“求”得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必须依靠不断的实践和大胆的创造，而不是静止的依靠老经验和现成的事物。上面说的那些犯过反“冒进”错误的同志，在思想方法上恰恰是后者，即是形而上学的。他们对新生的事物总是诸多怀疑，对超越自己的老经验的行动总是放心不下。因此，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来到了，他们忧心忡忡，说粮食生产可以翻几翻以至几十翻，他们连想也不敢想。这样，他们的思想就老是落在实际后面，老是让实际牵着自己的鼻子走。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所作的按语说：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篇。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的，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们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象个样子呢？我看，解决这种人的思想方法是个关键问题。当他们真正掌握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正确理解“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是说，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就会既从实际出发，又不囿于旧的实际，永远走在实际的前头。

这就是我们从“马鞍形”中的哲学——思想方法论方面应该接受的教训。

上海华孚金笔厂的一个普通电镀工徐祖英，

去年就提出要把英雄笔套镀金成分中的黄金用量减少。可是，厂里的技术人员告诉他：“不行的，中外书本上都沒有过这种理论根据。”该厂的夜校教师也说他只有初中程度，研究这些问题还缺乏基础知识。徐祖英听了很不服气，他想：“鲁迅先生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为什么一定要书本上有了才去照章办事？难道我们不能先创造，然后再把它写上书本吗？难道要等几年再来降低黄金用量吗？厂长和党支部书记支持了他的想法，鼓励他大胆创造。徐祖英和配料工顾振华一起，试验一次又一次，失败一次又一次，连续试验了三十多次，终于成功了，把笔套镀金成分中的黄金用量从百分之九十二减少到百分之八十。单是一个华孚金笔厂，一年就可以节约四百两黄金。

象华孚金笔厂发生的故事，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我们已经听说了不少。故事的主角电镀工徐祖英，不仅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风格，他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哲学上的根本问题：人们认识的发展过程是怎样开始的？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徐祖英和这个厂的技术人员作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按这个技术人员的说法，似乎理论是实践的基础，而实践是依赖于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論）的。因为他认为从“中外书本上都沒有过这种理论根据”的实践是“不行的”。可是，电镀工徐祖英的答案恰恰相反，他认为应该是先创造（实践），然后再把它（理论）写上书本。那就是：实践是理论的基础，而理论必须依赖于实践，然后才能反过来指导实践的。

事实证明了徐祖英是正确的。因为他的看法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認識論的原理，而那个技术人员却掉进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論”中教导我们说：“辩证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实践摆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認識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認識离开实践的錯誤理論。”^①在这个问题上，那个技术人员显然是错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真理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認識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認識，又从理性認識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認識、再实践、再認識，这种形式，循环反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認識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这就是辩

^① 見“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295—296頁

証唯物論的知行合一觀。”^①在這個問題上，那個技術人員顯然也是錯了。

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者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在他們看來，理論並不是從客觀實踐中來，又回到客觀實踐中去，而是人們的主觀活動的結果，而一經成為理論之後，就是實踐的絕對的“根據”，人們只能按書、本（理論）行事，找不到“理論根據”的事情就想不得，說不得，干不得；這樣，用實踐發現和証實了真理，写出了理論的人們，就變成了“作茧自縛”，變成了書本的奴隸了。象這樣一種唯心主義的哲學，在過去，一直象如來佛的金箍圈，束縛着人們的思想，使人們的認識——實踐，不是“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是永遠停止在舊的階段。

我們提倡敢想、敢說、敢干的共產主義風格的哲學思想基礎，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這一理論武器，將會幫助我們更徹底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湧現出更多的象徐祖英那樣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先進人物。

農業社辦食堂，這是最近才在農村出現的新事物。辦食堂有許多好處，這是無論社幹部還是社員都已經體會到了的。可是，在這一新事物面前，却揭開了人們的不同的思想方法。比如，有一些幹部能夠預見到，或很快就預見到食堂對社員的生活將產生極其深廣的影響，而另外一些幹部，却只知道辦食堂就是為了解決社員的吃飯問題。這樣，當事物按着客觀的規律向前發展了，前一種幹部便能因勢利導，順水推舟，處於主動的地位。而後一種幹部則顧此失彼，招架不住，處於被動的地位。這種情況表明：農業社食堂中也有哲學。

農業社辦食堂有四大好處：第一，擴大了投入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增加了社員的收入；第二，節約了糧食；第三，節約了燃料，減少了社員的開支；第四，有利於發展養豬副業。這些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問題是，食堂既然是農業社員生活鏈條上的基本環節，它辦起來之後，就不可能不對社員的整個生活（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發生着普遍的聯繫和相互制約的作用。根據一些已辦好了食堂的農業社的情況看來，一般地已經出現或必將出現這樣一些現象：各戶在食堂開膳（一般以隊為單位），養豬由食堂經營，這樣，作為各戶種植菜蔬和飼料基地的自留地，就失去了作用，社員們會主動要求把自留地集中起來，由食堂統一管理；沒有了自留地，各戶當然就不再為解決自留地肥料而保留室內便桶和自積水肥、土雜肥了，這樣，家肥的公

私矛盾問題解決了，農村的环境衛生也將大大改觀；由於集中開膳，出勤和收工的時間大致上統一起來了，農民下地很象工廠工人上班下班；有了食堂，開會、學文化也好辦了，一張四方台，是飯桌，又是書桌，也是會議桌，真是“三位一體”；社員逐漸對按餐按日交米，感到不勝其煩，要求由食堂集中管理社員口糧，還有可能要求把口糧直接由社發到食堂集中管理。這是什麼性質的變化呢？過去小農經濟遺留給農民的最後的一點土地觀念徹底鏟除了，他們已經開始感到私有財產的累贅；散漫的生活習慣大大改變了，集體主義思想飛躍發展了。這是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民的整個生活面貌和精神狀態的巨大的變化，是農村的共產主義因素的萌芽的表現。

所以說食堂中有哲學，是作為生活現象的食堂問題，它不僅影響着農民的工作，而且對於農民思想意識的轉化還起着促進的作用。這種變化，反映了“各種事物和各種現象的聯繫和相互制約是自然界和社會的發展的普遍規律”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發展的學說。我們知道，估計社會現象的聯繫和關係的全部總和，是科學的預見和正確行動的依據。領導者能夠抓住工作中的“基本環節”，並估計到它的普遍聯繫和相互制約的關係，估計到它的發展趨勢，就能夠胸有成竹地促進事物的发展，做促進派。相反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就必然要象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那種“只知跟在車子後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了，企圖把它向後拉，開倒車”的促退派了。

產生右傾保守思想的根源固然是多方面的，從哲學上來說，不善于掌握“各種事物和各種現象的聯繫和相互制約是自然界和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這一原理，可以說是右傾保守思想的根源中的根源。

縣縣、鄉鄉、社社辦工業，這是最近才在農村中出現的又一新事物。從目前農村辦工業的積極性，從農村辦工業的巨大潛力，從農村工業正在遍地開花的情況看來，這一新的事物，具有巨大的生命力。看來這里面也有哲學。

農村辦工業，有兩大特點：第一，為農業生產服務；第二，就地取材。這兩大特點，集中地具體地反映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辯証唯物主義觀點。一般的，鄉社辦的工廠，主要是：顆粒肥料廠、農具製造修配廠、糧食加工廠（或農產品聯合加工廠）、沼氣發電站等，有的鄉社還辦了釀酒廠（酒糟可作

① 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83頁。

肥料)、造纸厂(用稻草作原料)等。概括起来,叫做“用土办法办小小工厂”。这些工厂的投资都很少,有的甚至不花一个钱就办起来的。

农业社办工业,是一种对立的统一:既要搞农业,又要办工业,这是矛盾,办了工业,促进了农业,使工业与农业结合,这是矛盾的统一。用辩证的方法来对待问题的人,懂得它们之间的正确关系,用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观点来克服矛盾,解决困难,合理安排,不但工业办起来,而且办得快,生产快,收效大。但是,有人却只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的一面,没有看到统一的一面,因此,对于农业社办工业采取怀疑的、等待的态度,甚至以为“不务正业”,或则办了工业,就丢了农业。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認識論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論的具体运用,既要估計到实践中的可能性,又要估計到事物的发展。这样,就既不回避矛盾,又不加剧矛盾,而是正确地解决矛盾;并且能够主动地促使矛盾的轉化。农村办工业的必然发展前途是农村工业化基础上的农业机械化,这也就是农业与工农对立的统一。

今春,在潮汕平原掀起的平埔整地运动,更是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广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

潮汕地区人民自来迷信风水地理,视祖宗坟墓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解放前,这个地区引起官司和发生械斗的原因,十有八、九是由于风水糾紛,有的“打官司”打了几代人,不惜倾家蕩产,有的引起乡与乡、姓与姓之间的械斗,不惜流血牺牲,甚至結成世仇。这里面固然有封建倫理观念作祟,更多的还是风水迷信,以为崇奉死人,能得到“保佑”、“福蔭”,得罪死人,则可能“招灾”、“惹禍”。这种唯心主义思想的統治权,一直到解放以后,还没有被打倒。今年春天,只須几个回合,就给彻底打垮了。

第一个回合可以说就是唯心与唯物之爭。当时在群众中辯論了这样几个問題:世界上有鬼没有鬼?祖宗死后有灵没有灵?风水地理是真是假?經過了大鳴放、大辯論,唯心派被駁倒了。整个潮汕平原,到处張旗結彩,敲鑼打鼓,举行着庄严隆重的改造自然移风易俗的誓师大会。运动掀起来之后,群众又用自己的实践証实了确实没有鬼、没有灵、风水是騙人的。連从来不敢碰一碰棺材和死人骨头的农村妇女都卷入运动,亲自动手迁坟了。

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有一百多万座坟墓被迁掉,二百多万付骸骨被迁移上山,并且多数“入了

社”(搞公墓);隐藏在荒坟中的一百四十万只老鼠和十六万条蛇被消灭了;大块荒埔变成良田,高低不平、細小零碎的耕地連成齐整平坦的一大片。现在的潮汕农民一回想起过去的迷信,連自己也觉得好笑,他們异口同声說:“平得好,整得对!”揭阳县的农民說:“人走社会主义路,田也要变成社会主义田,才象个社会主义样!”

农民中的这种唯物主义的威力,还及于菩薩和“家神”,过去威风凛凛的菩薩和庄严神圣的神牌,都倒了大霉。

唯心主义被打倒了,唯物主义在潮汕农民中挂了帅了。农民从实际中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大战“中游思想”,这是整风运动第四阶段在国家机关中展开的一场思想斗争,也是一场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

“中游思想”实质上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形态。因为甘居中游的人,不管他持的是什么理由,归根到底总是牵涉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問題的。不过,从方法論的角度来看,倒是因人而异。比如:“条件論”者,就是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认为自己没有力争上游的“条件”。有人嫌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有人怨自己的历史問題还未解决,有人因为自己曾犯过什么錯誤。因此,觉得上游无望,甘居中游。总之,他們总是左一个条件,右一个条件。

唯物主义者不能只凭热情和勇气(当然,热情和勇气也是“力争上游”的必要条件)办事,不能只从主观愿望出发,必須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因此,条件是必要的。但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机械唯物主义者不同,他們不把条件当作現成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条件是人創造的。也就是說,辩证唯物主义者承認客观决定主观,但同时强调主观对客观的能动作用。人們只要掌握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規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轉移的),就可以用主观的努力来改变和創造客观条件。比如出身于剝削阶级的人,可以彻底背叛自己的出身阶级,历史还未作出結論的人,可以主动地帮助組織尽快弄清自己的历史問題,曾經犯过錯誤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行动来表明决心改正或已經改正了錯誤,这不就創造了条件嗎?其实,力争上游的过程,也就是为自己創造条件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者把这两个方面当作对立的统一。唯心主义者的所謂“条件論”是脱离客观实际的,机械唯物主义者則看不到主观的能动作用,这样,他們就都把自

已埋葬在“条件”堆里，甘居中游而心安理得。

列举了以上这些例子，目的只是要说明：在我们的时代，确实是人人都在从事哲学的实践，同时，又在实践中出哲学。谁遵循的是唯物主义，谁就必然在工作上 and 思想上力争上游，不犯或少犯错误，永远成为促进派；相反，谁遵循的是唯心主义，谁就象跛子走路，左右摇摆，有时还要蹉跎。哲学不可不懂，因此，哲学不可不学。

三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同哲学打交道，都在从事这样或那样的实践，那又为什么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那么高不可攀呢？现在应该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哲学的神秘化也是有个来源的。

我们已经知道，哲学是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任务，是要解放本阶级和全人类，要最后埋葬阶级社会，要建设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以辩证唯物主义为自己的世界观；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因为这个真理是为人们几千年的实践所证实了的，工人阶级又从自己的实践中发展和掌握了这个真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总是千方百计地来维护他们的剥削生活和狭隘的阶级利益；按照社会的发展规律，资产阶级又是人类最后的一个剥削阶级，它已经一天一天接近了坟墓。正是为了挽救资产阶级这种可悲的命运，他们才抓住了唯心主义，借以欺人自欺；因为唯心主义本身就是对客观真理的歪曲，就是极端玄虚的。唯心主义既然是歪曲真理，既然没有客观根据，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当然就各以各的主观来解释事物，弄得颠三倒四，矛盾百出，这样的思想体系怎么能见得人呢？于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就不得不把它打扮一番，这样，原来就够神秘的东西，加上他们的化妆术，就弄得更

加神秘，以至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胡说什么了。同时，经过化妆之后的资产阶级哲学，又冒充成唯一的哲学。这样，当人们还没有机会接触或还不能自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地陷进他们的迷魂阵里，总觉得哲学是什么神秘的、高不可攀的东西。当然，冒牌的终归是冒牌的，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人们已经或正在冲破资产阶级哲学的迷魂阵了。

现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角，响遍了全国每个角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更为哲学开辟了宽广的天地。工人、农民学哲学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大惊小怪了。学了哲学的工人说：脑子里放了个显微镜，什么事物一目了然，干劲和钻劲更大了。学了哲学的农村干部中间，出现了不少新气象：调查研究多了，主观主义少了，群众观点加强了。学了哲学的农民群众，也有不少收获：封建迷信少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志越来越坚定了，钻研新技术、学习文化也更积极了。哲学专业工作者从书堆里翻了身，走出了书斋，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生产中去。他们一接触了群众，深入了实际，就象刘姥姥走进大观园，什么都感到新鲜。他们有的人正在和工农群众一同劳动，一同学习哲学，一同总结工作，一同编写切合工农群众迫切需要的哲学讲义。一句话：在边干边学。

“我们应当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获得生动活泼的发展。我们应该尊重群众的实践，尊重群众的革命性和创造性，这才是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我们应当向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联系群众的许多同志（其中包括中央、省、地、县、乡各级党的和群众的大批领袖人物）学习，学习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刻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榜样，学习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严肃的原则精神同生动的独创精神相结合的榜样，学习他们同亿万群众在一起、看到了正确方向、抓住了真理、就为真理而奋斗、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榜样。”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第二次会议政治报告中关于理论工作的方向问题所作的这一指示，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国哲学界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論教育为政治服务和教育与劳动相結合的方針

龙世雄

全国人民正以冲天的干劲和排山倒海的毅力在全力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正以“一日等于廿年”的速度英勇地进行着改造自然同时也改造着社会（包括着自己）的斗争。以农业一馬当先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全面大跃进。教育事业也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教育事业的面貌正起着根本的变化。这是党的总路綫的灿烂光輝，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育方針的偉大胜利。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我們的教育方針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根据馬克思主义教育原則制定的方針，是灭資兴无培养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教育方針，是适应当前全国生产大跃进的需要，多快好省的教育建設方針，也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教育方針。方針本身体现出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教育必須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事业，在阶级社会中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而也必然是阶级教育的工具。在我国現在的历史条件下，教育事业必須与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要求相适应，因此我国的教育事业只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說过，共产党人需要改变教育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要将过去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教育改变过来，变成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方針的另一个特点是教育与劳动相結合。由于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发展，要求把过去阶级社会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割开来的现象逐步加以消灭，重新逐步把它們統一起来。列宁說过：“如果不把青年一代的教学和生产劳动結合起来，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我們不可能把脱离生产的教学和教育或者把脱离相应的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提到現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識现状所要求的那种高度。”社

会主义要求体力劳动者同时是脑力劳动者，因为只有掌握高度技术文化知識的工人和农民，才有可能不断提高和創造新的生产技术。此外，社会主义不仅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的剝削制度，还必须消灭（虽然是比較长期的）资产阶级的残余的剝削思想，如脑力劳动者瞧不起体力劳动者的思想等等。教育与劳动相結合，就使我們能够逐步完成以上的任务。

教育为政治服务和教育与劳动相結合，是党一贯的主張。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上完成，教育与劳动結合的問題更显得特別重要和特別突出。党的八大第一次會議关于政治报告的決議曾提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經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发展生产力……。”教育与劳动相結合，将使我国教育机关培养出更多更好德才兼备、体魄健全的干部，对发展生产力将起巨大的作用。如果教育与劳动結合的問題沒有很好解决，則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問題也就不能彻底解决，因为这两方面是密切联系着的。

毛主席的教育方針与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精神是一致的，是适应“三个并举”和“两个革命”的客观形势要求的。从最近半年来执行的結果看来，这一方針是完全正确的，它所起的作用是异常巨大的。目前我国已轉入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新时期，教育事业如何才能多快好省地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呢？为使工农生产技术和劳动效率繼續不断提高，掀起全民性的技术革命高潮，教育事业就必须培养大批工农知識分子和改造资产阶级的知識分子；一方面使广大劳动人民能更快更好地掌握和提高文化技术知識，另一方面使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彻底地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正是党的教育方針正确地解决了这个問題。目前教育工作正在采取公办民办并举，普及和提高并举，正規和业余并举（业余也是正規的）的方針，打破了一切旧的办学傳統和办学方法，打破了对专家、对科学知識、对书本的迷信，在最短期間

內扫除了文盲，普及了小学教育，要做到每乡每社办中学，省、专区、县办大学，使教育事业获得空前未有的发展，以适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一向被认为高不可攀、非有大洋房、大设备、大图书馆、非依靠专家办不起来的高等专科学校，今天依靠地方、依靠群众，一下子就办起来了。如黑龙江省在几个月内就办了16所高等学校，浙江29所，江西27所，河南87所，在广东，省市和各专区、县提出的共有60所，其中由省、市、专区办的有20余所。特别是各地采取了工厂、合作社办学校，和机关学校办工厂、办农场的做法，采取了工厂、合作社全日劳动业余学习，学校全日学习业余劳动的办法，工厂农村的半工半读办法和学校的半工半读办法，使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有了一个恰当的組織形式，这不仅是适应当前社会主义建設新形势的需要，而且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步骤。

贯彻党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是一场剧烈的斗争。因为这是教育思想和教育工作的革命，必然会在教育工作者特别是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上和行动上引起一场剧烈的斗争。这一个斗争，其本质是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剧烈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解决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是反对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两种敌对的政治立场问题；在整风运动中，经过“双反”批判了“三风”“五气”，打垮了资产阶级的歪风，树立了无产阶级的正气。经过“交心”，批判了个人主义的各种名位思想，迷信思想和颓废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人生观；更重要的是通过“交心”一般地解决了中间分子的立场摇摆不定，使他们进一步摆脱右派分子的政治影响，向党靠拢。通过“红专”辩论，着手解决学术思想上的立场问题（其中包括了教育思想、教育与政治的关系等），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后一个阵地，还没有彻底解决。目前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正是进一步跟踪追击资产阶级思想所盘据的最后一个巢穴，要打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党向劳动人民翘尾巴的最后一张“王牌”，以便彻底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及解决一系列与教学有关的态度、观点和方法等问题。

目前在高等学校中，对于教育为政治服务的问题，还存在着不少抵触思想。这首先表现在对待高等学校的党的领导问题上，也就是党对教育工作能

不能和该不该领导的问题。在红专问题的辩论中，有人表示政治方面同意党的领导，至于学术方面就怀疑党的领导，或者对党的领导很不服气。如说“政治地盘是你的，学术地盘是我的”，“在学术方面应该远远跟着党委，近近靠着专家”等等。有的人在总的方面来说也承认党应该和能够领导教育工作，但对于自己具体部门、具体业务就坚持自己的一套，不愿党过问，认为会搞乱了他的系统；有的对批判政治思想上的错误比较容易接受，而对批判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却是寸土必争。关于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一些右派分子就是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有一手，还可和党较量较量，而且也还有它的市场，中间分子在红专辩论之前，对这个问题也并未解决，甚至少数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也没有彻底解决。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问题，关系非常重大，如果问题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究竟教育是为政治服务还是为教育而教育，如果不在学术思想方面也接受党的领导，插上红旗，还是会走为教育而教育的道路的。

对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的不正确看法，也是妨碍教育要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方针的贯彻的。教师是教育工作的实际执行者，如果教师本身没有好好地解决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没有政治挂帅，那么就不可能在教学实践中自觉地贯彻党的方针，甚至还会对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思想和学术观点，这当然就谈不到教育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了。所谓“只专不红”、“先专后红”、“重专轻红”、“红易专难”、“粉红论”等等各色各样论调，归根到底是脱离党的领导、资产阶级个人名位思想。这些错误思想实质上是否认政治挂帅，否认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灵魂，是一切工作的动力和基础，不承认政治可以并且应该管业务。很难设想，对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存在这样错误认识的人，能够以身作则地去教育和影响学生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说他们会以本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行动，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去影响青年学生也跟着他们走上错误的为个人名利奋斗的道路，不是更正确一些吗？社会主义要求的是“红的专”，不是“白的专”。“白的专”必然会发展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让白色专家来培养白色的学生，还谈什么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要贯彻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就必然要在教育工作者中引起一场剧烈的思想斗争。

贯彻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也是一场斗争。有的人提出了所谓“特殊论”，认为综合大

学、工农学院对这个方针应该贯彻，也容易贯彻；此外一些专业学校就难贯彻，也可以不贯彻。特别是在勤工俭学问题上，有人认为工学院可以搞工厂，农学院可以办农场，与工农业关系不大的专业学院贯彻勤工俭学就会降低教学质量；有的认为自己的专业很“特殊”，特殊到不应搞农业和工厂，不能结合专业的一律不搞，对勤工俭学的方针应否在这一类专业学校贯彻也提出疑问。又有所谓“浪费论”，认为参加体力劳动是“浪费时间”，“浪费人才”，是“大材小用”。有的采取各种直接对抗或逃避的行为，有的认为勤工俭学无非是贫苦学生搞点学习费和生活费，自己家里有錢就拒绝参加。

教育与劳动结合是党坚定不移的方针，是改造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极其重要的一项办法，也是红专的道路；是贯彻党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的办学方针。为了摆脱旧大学留下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的一套办学方法，彻底改变教育脱离生产、知识分子脱离工农、脑力劳动脱离体力劳动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勤工俭学正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这不仅是为了使教育工作配合生产大跃进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要求，同时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教育方针。因此，特殊论是错误的。把勤工俭学完全脱离本专业的做法是不恰当的；片面强调结合专业，非与专业直接联系的就一概不搞更是错误的。否则，如外文专业、医学专业等岂不是可以取消勤工俭学的方针么？特殊论的又一借口是认为勤工俭学会影响教学质量。资本主义教育正是以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作为它的特点的，也据此作为教学质量好坏的衡量标准。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来说，教育工作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正是教学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吗？浪费论也是反对教育与劳动结合的一种谬论。根据广东中山医学院和广州中医学院的下放干部的锻炼收获看来，农业劳动和他们的专业虽无直接联系，但他们在劳动生产中，除了政治思想上的收获外，都进一步体会到过去在教学工作方面脱离农村实际，该教的不教，教了的用不上；在医疗工作上过去忽视预防为主、与工农相结合、团结中西医、医疗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的贯彻；精简治疗过去虽经领导反复提出，但从来贯彻不下去，片面强调复杂的不必要的检验，忽视发挥医生的主观能动性；忽视治疗，片面强调诊断；忽视大量的威胁劳动人民健康的疾病，片面强调发展专科；缺乏对工农的情感，医疗作风恶劣等等，正是在体力劳动和农民接

触中进一步认识到的。批判这些错误的学术思想，给今后提高教学工作、医疗工作和研究工作的质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此可见，说勤工俭学和体力劳动会影响教学质量是没有根据的，即使在贯彻执行中出现了一些缺点，但都是能够克服的，不能因此连正确的方向都否定。在劳动中，绝大部分干部正逐步成长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全面发展的国家干部，这是浪费人才、浪费时间和大材小用吗？他们还在劳动中创造了不少新办法新技术，有利于农牧生产；他们又把文化知识交给了农民，培养了大批农业社的保健员和乡的接生员、卫生员等等。只有在校门内的脱离劳动的教育，才真正是浪费人才和浪费时间。

除了要扫除上述种种妨碍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的错误思想外，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还必须解决与方针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这些也是高等学校教学整改中的一些带根本性质的问题。

首先是贯彻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阶级路线问题。高等学校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科学知识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基地之一，为达此目的，就得解决两个倚靠和两个培养。——倚靠什么人办学和倚靠什么干部去担当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培养什么师资和培养什么学生。党的正确的方针决定以后，还必须有正确的组织路线去保证。跟着中小学教育的普及，目前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就应当着重于培养工农出身的子弟，同时改造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1955年高等学校的肃反运动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总结出一条基本的经验，就是绝大部分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从广东几所高等学校历年产生的“废品”（包括政治思想反动，道德品质败坏，抗拒国家关于毕业生的统一分配等）看来，绝大部分也是剥削阶级出身的。1956年国际上帝国主义两次反苏反共高潮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暗流泛滥，很快就在高等学校中得到了反映。

高等学校在1956年以来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异常剧烈的，虽然右派分子是少数，但左派也是少数；而大部分中间分子曾一度迷失方向，和工农群众的共同语言很少，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共同语言较多，正是因为这样，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才敢那么猖狂；也说明高等学校的队伍，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非劳动人民出身的教师职员学生，在鸣放期间政治上敌我不分，思想上极度混乱，正是右派分子能够猖獗一时的社会基础。倚靠党办校还是依靠资产阶级专家办校

(教授治校)等問題,应当根据最近党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进行认真的检查,展开大辯論,并加以解决。此外在学生工作方面,由招生、教学实习、成績考核,一直到毕业分配等;在教师工作方面,由使用,到提拔、培养等,都要把阶级路線的精神认真地具体地贯彻下去。沒有明确的阶级路線,党的方針的贯彻还是沒有保证的。

其次是理論联系实际问题。这是当前高等学校在教学整改中一个比較普遍又比較突出的問題。理論脱离实际与理論联系实际是两种教学方針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不是一个技术性的問題或单纯思想方法上的問題。理論联系实际是在教学业务上如何具体贯彻党的教育方針的問題。教学质量的高低,应该以理論是否联系实际为标准。譬如馬列主义教学质量的高不高,不仅要看学生在政治实践和生产实践中的行动表现,还要看老师的行动表现。在中山医学院有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公开声明反对馬列主义的宗教徒,他們在考試的时候,很多都得了五分,这种理論脱离了思想改造的实际,还談什么质量!如果馬列主义教师本身就不是馬列主义者,那能教出具有馬列主义立場、观点、方法的学生来呢?因此要認真解决理論联系实际问题,首先就是立場問題,对待社会主义事业对待培养出来的国家干部应该負什么責任的問題。

再次是如何进一步解决有关教学的观点、态度、方法上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树立教学工作中的馬列主义指导思想問題。在高等学校的教学整改中暴露了不少教学內容中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如中山医学院药理学中不講或很少講中藥,卫生学中不講农村卫生,英文拉丁文中还有不少从解放前的旧課本照

搬过来的例子,如“唯勇士能配美人”“上帝的旨意”等等令人作嘔的詞句和腐朽的观点,还拿来当作教材用。在教学态度上重研究輕教学,不認真备课,如上課故意拖延時間,信口开河,甚至一本講稿用几年;带学生实习的老师溜到別处写自己的論文,賺稿費去了;有的教授要把实验超时的同学用棍棒赶出去。更普遍的是教师脱离学生,不深入学生,因此更談不上什么全面培养,全面負責。在教学方法上沒有很好贯彻辯証唯物主义的方法,系統不清,重点不明,一科之內或几科之間的内容互不联系,老师只教基本知識不教正确的思維方法。由于沒有树立辯証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就影响教学质量,同时增加了学生的負担,学生每每要花上几倍時間去搞通老师沒有講通的問題。所有这些,都是由于教师們的教学态度、观点和方法不正确給教育事业所带来的損失与危害,为要正确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針,就必须彻底解决这些問題。

党的教育方針,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当前全国正向文化大进军,过去一切为资产阶级知識分子认为不能办、不敢想的事情,劳动人民都办到了;过去被认为劳动人民不可能逾越的科学知識的圍牆被冲破了。劳动人民不仅动手自己把中学、大学办起来,而且办得很好,这正是毛主席和党的教育方針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并获得光輝成就的証明。广大人民群众首先认真地贯彻了毛主席的教育方針,做出了許多成績,正确解决了教育为政治服务和教育与劳动相結合的实践問題,这就很值得我們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同志注意,必須放下狂妄自大的臭架子,認真向他們学习,以求得我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大跃进。

广州市第一个工人哲学学习小组

广州市第一个工人哲学小组,已于七月初在中一烟厂成立。中一烟厂許多工人经过整风运动之后,都迫切要求学习政治理論,在整风运动中职工們思想解放之后,打破了学习理論的神秘观念,在工厂党委发起和工会的积极支持下,采取自动报名的办法,成立了第一个哲学小组。这个哲学小组共有十四人参加,由从技工提拔为車間主任的楊庆(党员)担任組长。小组成员的絕大部分是工人,文化程度都不高,絕大部分只有高小程度,小部分具有初中文化水平,个别有高中文化水平,但他們对学习哲学满怀信心。工厂党委和中共河南区委

均极其重視这个工人哲学小组,各派輔導員一人参加輔導工作,中共河南区委书记有时还亲自下厂参加和指导这个小组的学习討論会,这对小组成员的学习热情和信心,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目前这个小组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矛盾論”和“实践論”为中心,采取結合目前党的政策和決議,密切联系工厂中的实际問題和个人在工作上、思想上的問題的理論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进行学习。每星期学习两个晚上,一个多月来成績显著,解决了不少問題特別是一些思想問題,組員們普遍感到提高了認識。(放)

資產階級民族學的反動性和反科學性

黃朝中

資產階級的民族學和資產階級的其他社會科學一樣，都是資產階級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產物，是為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服務的。資產階級民族學發展到了帝國主義時代，更加鮮明地顯出了它的反動的 and 反科學的本質，其中英國的功能學派和美國的心理學派就是現代資本主義民族學的两个急先鋒，一直為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和殖民政策充當卸用的工具。功能學派的“勇士”們想盡辦法企圖保留殖民地附屬國的落后制度，通過間接統治的方法，去壓迫剝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為垂死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服務；心理學派則大肆鼓吹美國生活方式，提倡世界主義，直接為美帝國主義統治世界霸權叫囂。它們的猙獰面目，是一眼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不管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進化學派也好，不管由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期的文化歷史學派和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功能學派以及盛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心理學派也好，也不管它們各個學派之間的論點有着什麼分歧，但是它們都有着一個共通的基础：這就是敵視歷史唯物主義，否認生產方式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否認人民群眾是各族文化本身的創造者。同樣，資產階級民族學的所有的流派，它們都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的，它們否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否認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千方百計來掩蓋階級本質和反對社會革命，力圖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恆性”和不可動搖性。資產階級民族學還有一個更惡毒的本色，就是種族主義，它把各個落后民族或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都視為“野蠻”的，“史前”的，沒有什麼文化和歷史、也沒有什麼生命力的。因而，這些民族，照他們看來，生來就要受所謂“文明”民族的奴役和統治、甚至要加以消滅的。這是徹頭徹尾地為帝國主義製造民族壓迫依據的謊言。

資產階級民族學的反歷史主義，從它最初的時候

開始已十分明顯，到了功能學派和心理學派就更加露骨，正如托爾斯托夫概括地指出的：“在二十世紀二十——三十年代，資產階級民族學發展中的主要傾向，尖銳地反對揭示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偽歷史主義、黎克特的所謂‘歷史主義’。到了四十一——五十年代，則一眼就可以看出完全對立的傾向——強烈的反歷史主義。現代資產階級民族學中兩個勢力最大的學派：英國的‘功能學派’和美國的所謂‘心理學派’，正是在自己的身上打上了這樣的烙印，這兩個學派都是忠心不二地服務於帝國主義的。”^①

從上所述，可見不論資產階級民族學的那一個學派，都是極端反動的。雖然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和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它們的反動性有着某些程度上的差別，但都是反歷史反科學而且都為資本主義利益服務的本質是一致的，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就直接成為它的殖民主義服務的工具。

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族學就是直接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搬進來的，不是英國，就是法國，而最後主要是美國，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族學者，主要也是從資本主義國家“培養”出來的，有些直接由他們的國家來訓練（留學生），有些則通過他們在中國創立的教會學校來訓練，但是不管在那裡，帝國主義者的目的都是要把他們“培養”成為“奴才”，作為侵略和奴役我國人民的代理人。西方資產階級的民族學通過了這些人物把它販運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來之後，就帶上了它的鮮明的買辦屬性，一方面為帝國主義服務，一方面為國內反動統治階級服務，擔負着雙重的反動作用。因而很快就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賞識，並積極予以支持，先後在中國創立民族學的“研究”機構和在各大學里開設民族學的課程，傳播資產階級民族學的毒藥，麻醉中國人

① 托爾斯托夫：資產階級民族學的危機。載民族問題譯叢1957年第11期。

民。1935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学者和社会学者并集结起来建立他们的“中国民族学会”，出版刊物，撰写文章，以扩大他们的反动影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积极进行少数民族的“调查”，一方面直接间接为帝国主义提供情报材料，另一方面则为国民党反动派找寻压迫、同化少数民族的“理论”根据，说什么中国的少数民族都是“汉族的宗支”，和蒋介石的臭名远扬的“中国之命运”互相呼应。所以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输入中国之后，就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的灾难，而中国的一些资产阶级民族学者就成为这些灾难的直接制造人。所以他们所从事的所谓“研究”、“调查”、甚至连他们的一切，人民都早已把它当作“垃圾”而抛弃了，但资产阶级民族学者居然还视为至宝，念念不忘，直至解放以后，还要我们加以“恢复”，这是多么的反动啊！

资产阶级民族学者杨堃在他所写的“什么是民族学”一文中，公然向党和社会主义攻击，大肆叫嚣要恢复早已为历史所抛弃了的反动的“中国民族学会”，作为恢复旧中国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先锋，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开辟道路。他说：“自1928年起，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即设立了民族学组，自1935年起，就成立过中国民族学会，自1936年起，前中山文化教育馆还编印过民族学研究集刊，……然而在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反而不被重视……？”他提出了这样的极端不满的质问之后，就诬蔑党对于解放前的“文化遗产”不予“重视”，接着就想以实际的行动并且组织起来与党对抗，大叫要将“久已停顿的中国民族学会迅速地恢复起来，”^①这是何等的狂妄！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民族学并不是什么香花，而从来就是毒草；旧中国资产阶级民族学也不是什么“文化遗产”，而完全是封建的、买办性的糟粕；而旧中国的民族学会，更加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机构，至于他们出版的一些刊物，如民族学集刊和论文集之类，又有那些不是宣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而为国内外反动派服务的呢？但是解放以来，我国的资产阶级民族学者不但不愿意去正视自己过去的错误和罪行，反而还拿这些反动透顶的东西作为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不但不肯痛下决心，改造自己，反而对那些东西死抱着不放，有的只改头换面又混进了民族调查研究工作的队伍，有的则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偷偷摸摸地贩运他们资产阶级民族学的“私货”。由于我们对这些资产阶级民族学者的警惕不足，以致在近年来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在少数民族的调查工

作中造成了不少的损失。他们的一部分人（如费孝通之流）窃据了调查组的领导职务，并通过这些合法的地位来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反对党的领导，篡改中央的调查工作方针，企图把我们的调查工作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吸取的教训。

资产阶级民族学者在调查工作中完全使用了他们过去的老一套，其中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轻视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调查，专门注意那些“奇风异俗”的上层建筑的东西的描绘。这，看起来好象仅仅是一重一轻的问题，而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通过经济基础的了解才能认识社会的本质。但是资产阶级民族学者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文物制度，意识形态这些东西可以决定社会生活的性质和变化。如资产阶级民族学者、右派分子吴泽霖就公开提出无须调查经济基础，通过婚姻、节日……等这些东西就可以从中推断苗族是否经过奴隶社会问题。所以他专门去调查一些极为无聊的事情，如苗人的性生活，睡觉是否光着屁股和厕所的形式……等等。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民族学者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已到了什么程度。

资产阶级民族学者在调查工作中另一个特点，就是离开了阶级观点，企图掩盖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而取消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是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历史，没有阶级观点，就不可能透视社会发展的内部规律，例如杨堃1951年在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他把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认为是农民对地主应尽的“义务”，认为地主阶级对农民负有周济、保护和教导的“功能”。看，这是什么人说的话。杨成志1956年在广西大瑶山调查，把阶级矛盾说成是民族矛盾，把“长毛瑶”和“过山瑶”对立起来，说成是“两个对立的营垒”，抹煞他们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并把劳动人民贫苦的原因，归咎于“人口多、土地少，解决生产资料有困难”，于是以马尔萨斯的反动的“人口限制论”来代替社会革命的原理，直接为地主富农阶级作辩护。

资产阶级民族学者在调查工作中再一个特点，就是大汉族主义，把少数民族看成为没有什么生命力的民族，把少数民族描写得十分“野蛮”，如说

^① 杨堃：什么是民族学。载1957年云南大学学报。

什么“性强悍，不服教化”等等，专找残余，夸大落后，把许多少数民族都说成还处于非常落后的原始社会状态，甚至说成为“残存社会”。一提到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水平，总离不开“刀耕火种”这些最落后的形容词，把许多风俗习惯都描写成为极端“野蛮”和落后的现象，而不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它们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令人难于容忍的就是右派分子费孝通，公然反对党和政府帮助少数民族摆脱落后贫困的状态，引导他们走上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说“独龙族解放后变化太快，最好把他保留下来作一个标本”。这是什么人的心肠呢？正是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土族”人民的恶毒心肠。

资产阶级民族学者在调查工作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观主义，未经调查，则先下结论，或者是先划定一个框框，然后再去找材料来证明它，合乎自己主观结论的材料就要，不合乎自己主观结论的材料就不要，和胡适之流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根本是一个娘胎，岑家梧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如对于黎族合亩制的性质问题，根本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他就一口断定“上限不到母系社会，下限不到阶级社会”，并主观认定黎族合亩制就是“父系大家族”。右派分子吴泽霖也是如此，对苗族的历史源流和经济结构还没有弄清楚，就肯定“苗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调查方法。

资产阶级民族学者在调查工作中所反映出来的种种非马列主义观点，当然不只上面所举的这一些例子；同样，这种支离破碎、繁琐主义的调查方法，也不是他们的独创，而正是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者所惯用的方法在中国的翻版。资本主义的民族学有一个鲜明的目的，就是要为资产阶级服务，因而就不能不去掩盖社会的实质，掩盖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国资产阶级民族学者继承了这一衣钵，结合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所以在他们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中，也就不能不反映出了和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者一样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这些东西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可能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而对于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也只能起消极和破坏的作用，因此，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民族学，只有坚决地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并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今天，跟各种形形色色的为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殖民政策服务的资产阶级民族学派作斗争，是当前哲学社会学界一项迫切的任务。因为资产阶级民族学在我国遗留下来的毒素不少，它的影响也还相当深刻，在去年大鸣大放期间，右派分子公然提出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民族学来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为资产阶级的复辟准备条件；不少右派分子还以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的反动谬论来向党进攻，企图达到他们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因而，我们绝对不能放松对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反动思想的批判。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晌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①破资产阶级民族学的思想体系，立无产阶级民族学的思想体系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正是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学和资本主义的民族学是完全对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反动思想，才能建立我国民族学的新的理论体系，正所谓“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道理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民族研究工作是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注意到民族问题，并把它作为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来处理，在延安时期就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了完全适合于我国革命的民族观和民族理论，特别是解放以后，胜利地解决了我国民族方面一系列的问题，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扬我们过去的光荣传统，密切联系我国当前民族工作的实践，学习苏联民族学的先进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建立我国的新的民族学，是完全具备了条件的。让我们毫无保留地把资产阶级的民族学埋葬掉，并用我们的智慧和双手把我国的马列主义的民族学建立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不久的将来的共产主义服务吧！中国民族学的前途是光芒万丈的。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必須在廣東少數民族調查 工作中插上紅旗

賴才清

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的工作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而且針鋒相对。这实质上是一场馬列主义社会科学与反馬列主义的資產階級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斗争，是在少数民族調查工作中拔白旗和插紅旗的斗争。岑家梧在調查組中，是代表資產階級社会学、民族学的一面白旗，在他任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組長期間，把資產階級社会学、民族学的一套反动观点，从各方面貫徹到調查工作中去，使調查工作遭受了很大的損失。必需彻底肃清資產階級社会学、民族学的影响，解放思想，才能多快好省地实現在一年內完成广东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工作的光荣和艰巨的任务。⊖

一

党的領導是取得革命胜利和一切工作成就的根本保證。民族調查工作也必須有党的領導，才能正確地开展和取得成績，达到为民族工作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要不要党的領導，这是我們和資產階級社会学、民族学者岑家梧之間的根本分歧。

中国共产党早在其創始时期，就开始了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来研究和解决我国民族問題，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延安成立了民族工作机构，更有計劃有系統地进行了民族問題的研究工作。解放几年来，各民族事务机关、民族自治地方各級党委，結合工作需要，对当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进行了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工作；在中央直接领导下，1956年开始，更有計劃地有系統地大規模地在全国範圍內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研究工作，两年来，共調查了20个民族，調查材料約一千五百万字，較系統地深入地了解了这些民

族的社会基本情况，这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設以及生产大跃进都是有益的。这一切成就給我們今后民族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創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資產階級社会学者却无视这些事实，說什么“我国已經有了30年历史的这門科学（資產階級民族学），在社会主义建設时代，反而不被重視”，⊙这說明他們別有用心地否定党的民族政策的輝煌成就和民族研究工作的巨大成績，妄想恢复反动的資產階級民族学。

事实証明，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来研究民族問題的中国共产党，才是民族研究工作的真正的內行。問題在于資產階級社会学、民族学者所要求的，不是为各族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的民族学，而是为資本主义服务的民族学。因此，在这些所謂“学者”看来，党对于民族学是“外行”，而他們自己才是“內行”。岑家梧就是这样自命为“內行”，要“专家挂帅”，在調查組內篡夺党的領導的。他任意篡改中央关于調查工作的方針；不接受当地党委的領導，認為当地党委对調查組的作用“仅仅是調配干部和物質供应”，因而有关調查工作的規划、工作情况和調查材料等等，都不向当地党委請示会报；党委經過多年的实际工作和調查掌握了大量材料，对我們的調查工作有很寶貴的指导价值，依靠党委的材料进行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岑家梧对这些材料根本不看。正是由于岑家梧不接受党的領導，在組內另树

⊖ 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直接领导下于1956年8月成立，同年10月开始进行調查工作。按原来規划，要求五年內完成广东各少数民族的調查。現在从新訂出跃进規划，規定一年內完成广东各少数民族的調查工作，并写出黎族、京族的簡史、簡志。

⊙ 楊堃：“什么是民族学”

一面白旗，因此使1956年10月至1957年6月这一段时间的調查工作，迷失了方向，犯了路綫上的錯誤。

岑家梧自命为“专家”、“內行”，其实，只不过是調查工作中，販运早已被否定了的资产阶級社会学、民族学的老貨色。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再一次証明了这套貨色臭不堪聞，我們对资产阶級社会学、民族学必須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

二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經济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条件，上层建筑是在經济基础上产生的，是为經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必須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級分析方法，着重从社会經济结构和阶級关系来認識社会，改造社会。少数民族的調查工作，也就必須首先弄清楚社会的經济结构和阶級关系，才能真正反映社会的客观面貌，以便为民族工作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

中央关于調查工作的方針明确指示：“首先調查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所有制和阶級情况，然后，尽可能收集历史发展資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进而对各民族的历史作系統的研究”。这一指示是从民族工作出发、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与此相反，资产阶級社会学、民族学及其社会調查的本質，就是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級分析，否定經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決定作用，以达到歪曲少数民族社会面貌，抹煞阶級存在和阶級矛盾，反对阶級斗争和无产阶級革命。因此，他們的社会調查，从来就不从阶級结构和阶級关系来观察社会，而总是偏重于对上层建筑，对非本质的、次要的社会現象作繁瑣主义的調查。

岑家梧就是以这一套资产阶級社会学、民族学的观点，篡改了中央的方針。在他所制定的工作规划中，把“上层建筑各方面”与經济基础平列起来，不分主次，而在实际工作中則本末倒置，偏重于調查上层建筑：岑家梧所制定的“黎族合亩制社会調查提綱”，上层建筑部份分量多，而且罗列問題特別詳細繁瑣，經济部份則分量少而簡單，同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农业与副业、合亩演变与生产資料占有关系等等，也不分主次甚至本末倒置。第一期在毛道乡作了三个多月的調查，人口、地理环境等一般情况的調查就占了四分之一的時間，生产資料占有关系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問題，却只有七、

八天，但他还认为經济部份已調查得“很具体”了，上层建筑要更“深入細致”調查。对婚姻制度、宗教等津津有味，反复核对，对經济基础則馬馬虎虎，甚至不加过問。在这种资产阶級社会学、民族学的思想影响下，造成某些調查互相矛盾，和某些重大問題被遺漏。例如合亩地区何时开始使用鉄犁，說法不一，出入很大，沒有得到核实对証，去伪存真。調查中发现了許多土地租佃、买卖的綫索和土地集中的材料，也置之不理，不加深入調查。象毛道乡地主恶霸王老达、王老南都各占有耕地一百多亩，达毛道七个村耕地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材料反而被抛弃了，在“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調查”綜合报告中只字不提。

三

調查研究必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服务，也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需要，党十分重視調查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因此民族調查工作必須反对厚古薄今，提倡厚今薄古。

资产阶級社会学者恰恰相反，他們用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調查工作中厚古薄今，专找“残余”和“落后”，把現象当本質，往往是抓住一些“残余”，就据以推断一个社会的性质。

岑家梧就是这样来进行調查的。一提到黎族社会，就言必称“合亩制”，就离不开“刀耕火种”啦，牛踩田啦，血緣紐帶啦，母系残余啦，等等。在他看来，似乎黎族社会特别是合亩制地区就是原始社会了，对这些东西特別感到兴趣。我們知道，黎族人口总共有四十万左右，解放前早已进入了封建社会，所謂合亩制地区，虽然原始残余比較多一些，但也只不过是黎族社会的一小部分而已（只有一万三千多人）。我們原計劃三年內完成黎族社会的調查，由于“好古”，岑家梧用来調查合亩制地区的時間就占了一年半，而在合亩制的調查中又怎样呢？当然也貫穿了厚古薄今和主观唯心主义一套。他在未調查以前，就給黎族合亩地区划定了一个框框，即所謂“上限不到母系社会，下限不到阶級社会”，下了“合亩就是父系大家族”，“氏族制度还比較完整”等等一系列定論。所謂調查，只不过是为主观定論找論据而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調查什么，不調查什么，以及材料的取捨，

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自己的主观定论。其实，在岑家梧认为最原始的合亩制地区，解放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已经是所有制的基本形式，社会政治制度基本上也是为私有制度服务的，更不用说地缘关系已经代替了血缘关系了。可是岑家梧把这些不符合于他们主观定论的东西一一抛开。在毛道乡调查期间，硬要把氏族会议的内容从合亩集会中找出来。听说亩头之上有个总亩头（其实是假的），便不分真伪，断言是好材料，要深入调查，以肯定其主观想象中的氏族组织。收集到一点母系残余，就奉为至宝，马上大做文章。为了论证其“父系大家族”的“结论”，甚至有意片面强调某些原始互助习惯；把二户至几户所有的土地一律划为公有，以增加公有成份；发现了三个各占有土地一百亩以上的地主恶霸的材料，把其中两个抛弃不用，另一个即王老本则当作是“例外”的，这样一来，毛道乡俨然就是“原始”社会了。

我们反对厚古薄今，主张厚今薄古，绝不是要抛开这些原始残余现象，而是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事求是地按照社会的原来面貌去调查它解释它。因为我们的调查是要为现实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黎族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有着光荣的历史，从抗日战争时期起，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坚持革命斗争；解放后，黎族人民实现了自治权利，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各项政治运动，实现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大大地发展了生产，生活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现在黎族人民正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干劲冲天地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而奋斗，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地改变着。调查上述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问题的科学研究都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可是岑家梧对这些问题是丝毫不感兴趣的，因此根本不重视这方面的调查。试问，如果按照岑家梧这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专找“残余”的资产阶级民族学观点来进行调查，怎能为社会服务呢？有什么科学价值呢？

四

资产阶级社会学、民族学者不经过彻底的改造，转变他们反动的阶级立场和学术观点，不彻底

消灭个人主义，是不可能进行任何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调查和研究工作的，这从上面所述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里要特别提出来的，是那些所谓“专家”、“学者”们参加调查，原来就是为了个人主义的目的。岑家梧在调查工作中，不接受党的领导，篡改中央的调查工作方针，重上层建筑，轻经济基础，厚古薄今，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等，一系列的错误，是和他带着卑鄙的个人主义目的来参加调查分不开的。他到广东来参加调查工作，只是为了要写一本“中国原始社会史”，“出奇制胜”，“一鸣惊人”，成为“权威”。因此，他以“专家”自居，关在房子里不参加实际调查，只管个人“研究”，不顾国家任务，搬用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套，指使调查组干部专门为他收集自己所需要的材料。这样，在调查中某些基本问题被抛开了，例如各种农作物耕地面积和产量的比重如何；地主的土地来源、在其总收入中租额部份所占多少？解放后没收和分配了多少土地等等，都没有解决，造成调查材料的极大的片面性。

更恶劣的，是岑家梧经常向年青的同志灌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毒素，用“付博士学位”来引诱干部，同时还散播了“为稿费而奋斗”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了稿费，不惜带头盗窃集体劳动成果，把调查报告以至一些原始材料，稍加改动，就当作自己的文章拿去发表，助长了不少同志的个人主义和脱离政治的倾向，有些组员甚至不把调查材料公开，私搞“小仓库”，不问政治，埋头“著作”。刘少奇同志说过：“脱离了政治，就可能走向反动的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就可能陷入反动的政治立场”。调查组中，有些发展了极端个人主义的人堕落为右派分子，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因此，肃清资产阶级社会学、民族学的影响，必须同时彻底搞臭个人主义。

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中，进行肃清资产阶级社会学、民族学影响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在思想战线拔白旗、插红旗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社会主义必须占领全部阵地。

让我们在广东少数民族的调查工作中插上红旗，多快好省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民族调查工作任务。

中 东 局 势 縱 橫 談

陈 仲 达

一、中东人民敲响了民族解放的战鼓和美英的軍事干涉

資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已經到了垂死的阶段。世界第一次大战特别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現，开始了資本主义的总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陣营的形成和壮大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危机的发展，标志着資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亚非以及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就是我們这个时代人类历史的两个基本內容，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規律所决定的。近数十年來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与壮大，正是世界人类历史发展規律发生作用的具体表現，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黎巴嫩人民反对夏蒙美国集团的武装起义，是中东民族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夏蒙总统自1952年上台后，几年来一直推行着使黎巴嫩民族利益蒙受严重損失的卖国政策。1954年与美国签订了接受美国經濟“援助”的协定，又在1957年春天不顧人民的反对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还把一些港口和机場“租让”給美国，出卖国家主权，投靠美帝国主义；对内則鎮压和屠杀爱国反帝的人们，还企图修改宪法，实行法西斯独裁統治。因此，在今年五月就爆发了有广泛人民参加的武装起义。这是民族民主力量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之間的一場尖銳斗争，是中东民族解放运动总洪流的一部份。七月十四日，底格里斯河上的巴格达又响起了起义的枪声，这个曾經是人类文明搖籃的美索不达米亚盘地——伊拉克，在一个晚上人民便推翻了近40年來一直是帝国主义馴服的統治工具的費薩尔王朝，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使伊拉克从帝国主义反苏的桥头堡和侵略中东的基石一变而为反帝国主义的前哨陣地。伊拉克的費薩尔封建王朝和賽义德

政府，是英帝国主义长期苦心培植起来的傀儡政权，是英国和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东最順从的代理人。賽义德一貫效忠于帝国主义利益，因而被英国称为“最称心”的“四十年的老朋友”，在他执政的长时期中，做尽了出卖伊拉克国家和阿拉伯民族利益的一切肮脏勾当。伊拉克費薩尔王朝是巴格达条約的倡議者，是美英帝国主义者在中东的侵略基石。伊拉克革命的成功，一下子打断了帝国主义侵略的脊骨——巴格达条約，使帝国主义在中东地区拼凑起来的侵略集团失去了支柱。同时伊拉克革命的成功，还剧烈地动摇了整个中东的殖民主义鎖链。因此，伊拉克共和国的成立就有着特別重大的意义。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伊拉克革命的正义性与进步性，正由于这样，伊拉克革命才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支持。

可是帝国主义对中东民族解放运动，总是采取鎮压的政策。美帝国主义对黎巴嫩起义人民的斗争，一直是在找寻干涉的借口的，可是联合国秘书长哈馬舍尔德的声明和联合国“观察团”的报告，都沒有給美帝国主义提供任何借口的可能。美帝国主义于是轉从政治上物色一位能代替夏蒙而又是美国利益代理人的傀儡来充当黎巴嫩的总统。但是，伊拉克的革命风暴震撼着黎巴嫩和整个中东，在一个晚上便打乱了美帝国主义筹划多时的、企图干涉黎巴嫩內政的全盘計劃。美帝国主义在处处碰壁中，便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于七月十五日出兵侵占黎巴嫩；而英帝国主义又步美国后尘，于七月十七日出兵約旦。很显然，美英帝国主义这样明目張胆的海盜行为，是严重地破坏黎巴嫩、約旦的領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是对中东阿拉伯人民和亞非国家人民的严重挑畔，是置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安全于不顧的罪恶行为。美英帝国主义侵略黎巴嫩和約旦，并不是偶然的、突发的行动，而是蓄意已久的預謀，是它們企图鎮压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軍事陰謀的一部分，那是在苏伊士危机的时候就开始締結的

一系列秘密協定的結果。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首先是我國和蘇聯政府，嚴厲地譴責美英強盜對黎巴嫩和約旦的武裝干涉和對伊拉克共和國以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軍事威脅，堅決地要求美英強盜從中東撤退他們的侵略軍隊。

可是，美英強盜不但拒絕從黎巴嫩和約旦撤兵，而且企圖在聯合國玩弄政治陰謀，使它們對黎巴嫩和約旦的侵略變成既成事實和“合法化”，以便在這兩個中東國家的侵略軍站穩腳跟之後，進一步發動對中東其他國家、特別是伊拉克共和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侵略。同時，美英軍事當局還不斷地調兵遣將，在波斯灣、地中海和中東地區迅速結集大量海、陸、空三軍部隊，其中包括裝備各種現代化配備的海軍陸戰隊、傘兵、特別突擊隊、各種類型的艦艇、大炮、飛機，還有擁有原子武器的軍艦和戰術空軍等，以便從塞浦路斯、土耳其、伊朗、黎巴嫩、約旦、以色列到利比亞、亞丁、波斯灣的巴林群島等地區，形成一個環繞着伊拉克共和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軍事包圍圈。據路透社報道，土耳其軍隊集中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邊境，進行軍事準備，而土耳其外交部長並不諱言，這些措施是進攻伊拉克共和國的準備。約旦傀儡國王侯賽因於七月廿四日也曾公開對英國電視記者表示，他計劃干涉伊拉克共和國內政。事情是十分明顯的，無論土耳其或者約旦，沒有美英帝國主義者的指使，他們是不敢公开发表這樣露骨的挑撥聲明的。所有這些，就把美英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豺狼面目暴露無遺了。

二、美英侵略者走進了死胡同

世界歷史今天已經走進了這樣的時代，殖民主義者的炮艦政策已經不靈了。一方面，由於強大的和平民主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力量的發展和壯大，使帝國主義者的一切侵略行動遭到嚴重困難。因為在這樣的历史條件下，如果帝國主義竟敢發動戰爭，那末，所有愛好和平和愛好自由的國家和人民必將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徹底地消滅帝國主義侵略者，以維護世界的永久和平，這就不能不使帝國主義者顧慮重重。英法帝國主義武裝侵略埃及之遭到可恥的失敗，正是最好的證明。另一方面，民族解放運動是現代世界歷史的不可抗拒的潮流，被帝國主義奴役和壓迫的民族和國家紛紛覺醒，力圖掙脫殖民統治加諸他們身上的枷

鎖，謀求民族的獨立與自由，這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的。而且由於民族解放運動之正義性與進步性，必然獲得全世界人民的廣泛支持，並最終取得勝利。美英帝國主義在中東問題上所玩弄的一切政治陰謀，在普遍覺醒了的世界人民面前被粉碎了，而它們的軍事恫嚇政策，也並沒有吓倒中東人民，反而更激起世界人民特別是中東人民的義憤和反抗，更加速中東阿拉伯民族的獨立鬥爭和亞非兩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因為從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埃及等國家反帝鬥爭的經驗中，亞非人民和拉丁美洲的人民都知道，歷史上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從來就是通過反復的反帝鬥爭發展起來，並且最後取得鬥爭的勝利的。特別在今天，當國際力量對比發生了東風壓倒西風的新的變化，世界形勢正進入第三個歷史轉折點，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發展，是促使這個歷史新時期變化發展的两个基本因素。所以，在這個新時期中，一切被壓迫國家和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反帝鬥爭，絕不是孤立的。特別是在1955年亞非會議之後，由於亞非會議精神所影響，亞非各國包括中東阿拉伯國家和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更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發展起來。所以，今天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鬥爭，絕不是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政策所能鎮壓得了的。這次美英帝國主義運用早已破產的“炮艦政策”來恫嚇中東人民，反而使中東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進行鬥爭。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與伊拉克共和國迅速簽訂了共同防禦協定，正好是這些軍事恫嚇政策的最有力的回擊。在黎巴嫩，起義部隊並未為武力所屈服，反而聲明要逐屋作戰，鬥爭到底，以致美國侵略軍開始感到處處草木皆兵。特別使美帝國主義者傷透腦筋的，是有很多親西方的政界人士，都對美軍在黎巴嫩登陸感到不滿。黎巴嫩議會議長奧塞蘭在美軍登陸第二天，就打電報給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譴責美國對黎巴嫩的侵略。在約旦，英國侵略軍的處境也很不妙。一位“泰晤士報”中東問題記者在報道中公開承認，約旦國王侯賽因政權不得人心，而“約旦大部分居民對侵入他們國家的英國人懷着敵對情緒。”據說約旦首都安曼在一週內就發生五起爆炸案，全國各大城市都爆發示威遊行和有組織的罷工，使得英國侵略軍胆戰心驚。傀儡侯賽因則在人民反帝鬥爭的風暴中吓得神經失常，他的王宮里也早已準備好直升飛機，以便隨時逃跑。

中國古話說得好：“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伊拉克、黎巴嫩、約旦以及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爭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是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全力支持的。到目前为止，承認伊拉克共和国的已經有四十多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連美国和許多西方国家也不得不被迫承認。要特別指出的，是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对美英侵略一开始就提出强有力的警告。社会主义国家的千千万万的人民举行示威游行，集会抗議，这是对侵略者的譴責和警告、对中东人民反帝斗争的支持。納賽尔和赫魯曉夫的会談，以及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分別在七月十八日和十九日提出严正声明和抗議，表示对美英帝国主义的冒險的軍事行为不能袖手旁觀和置若罔聞。这就使得美英帝国主义坐臥不安。目前美英侵略者赤裸裸的海盜行徑，不仅受到中东人民有力的回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抗議，就是在西方国家，“也沒有得到广泛的支持”。1950年美国发动侵略朝鮮的战争，还能够挟持联合国非法通过決議，糾合了另外十五个仆从国家組成以美軍为首的侵略朝鮮的“联合国軍”，打着联合国的旗帜进行了毫无人性的侵略战争，而今天，美国官方也不得不承認，要在联合国里控制三分之二的票数来支持他們在中东的侵略行为，“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委內瑞拉和墨西哥表示冷淡；欧洲的西德暗里埋怨美国干涉黎巴嫩；瑞典、挪威、丹麦和比利时也被激怒了；法国虽然是支持干涉的，但因为它的一千八百名軍队在貝魯特海岸被拒絕登陸而感到非常不滿。在亚非两洲，美国所要爭取的沙特阿拉伯，不允許美国使用在扎赫兰的空軍基地，并且拒絕运石油給約旦。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大多数亚非国家都反对美国。在美英两国国内，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倫也碰到重重困难。在美国，虽然好战分子和資產阶级反动报刊繼續叫嚣战争和扩大侵略的，但普通美国人是反对美国政府的軍事干涉，而头脑清醒的某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掩盖不住他們对美国侵略行为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的忧虑和沮丧心情。一些美国議員如共和党参議員詹納尔指責美国政府出兵黎巴嫩是“制造歇斯底里和把士兵派到黎巴嫩送死。”英国下議院在工党議員約翰·貝尔德领导下成立了“制止战争”运动委员会。委员会譴責麦克米倫政府侵略約旦，并要求英軍撤出中东，这个委员会还号召英国人民举行抗議大会和游行示威来反对政府的“石油战争”政策。以上一切說明美英侵略者在政治上已陷于空前孤立，在中东的軍事冒險行为有如

走进死胡同，进又不能，退也不易。这种进退两难的尷尬心情，連美国参議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委員汉弗萊也不得不說：美国对于在黎巴嫩的海軍陆战队不知怎么办才好，也不知道怎么退出来。美国著名資產阶级代言人、专栏作家李普曼七月二十四日在“紐約先驅論壇报”发表一篇题为“一場恶梦”的文章里，更把美国統治集团这种无可奈何的絕望心情暴露无遺，他說：“我們走到一条死胡同里。我們出兵不仅沒有希望解决促使我們出兵的革命形勢，而且軍队駐扎得越久，也就越不容易把軍队撤出而又不致引起当初出兵时想要防止的灾难。”汉弗萊和李普曼的話，可以为今天美国統治集团的尷尬、孤立和沮丧的心情写照。

可以肯定地說，在这种情况下，美英帝国主义在中东的軍事侵略冒險，必然会遭到可耻的彻底失败。但我們也必須警惕，美英侵略者虽是外强中干，但他們仍然是今天世界上最反动最凶恶的帝国主义者。他們在中东仍然繼續結集大量軍事力量，同时，对苏联提出的立刻召开五国首腦會議的建議，一直采取拖延和多方回避的态度，毫无誠意；而在七月底倫敦举行的所謂“巴格达条約”理事会會議上，美英帝国主义則磨刀霍霍，声言要坚持侵略立場，扩大中东的軍事冒險行动。在会上，美国表示将同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締結双边“安全防御”协定。在充滿火药味的會議公报里，仍重彈什么黎巴嫩和約旦受到“間接侵略”的濫調。在黎巴嫩，美国总统“特別政治代表”墨菲正加紧进行分裂黎巴嫩人民的阴谋活动。七月廿九日一位黎巴嫩美国大使館发言人竟公开宣布美侵略軍将长期占领黎巴嫩，而认为要到联合国对黎巴嫩的独立“提供足够的保証”，并且“黎巴嫩国内安全重新建立起来”以后，美侵略軍才撤出黎巴嫩。由此可见，美英侵略者在众叛亲离和途穷路末的时候，还是妄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所以我們对于它們在中东阴谋扩大軍事行动所造成的严重局势，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美英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一天不从黎巴嫩和約旦撤出他們的侵略軍队，我們就一天不放松保卫和平的斗争。

三、反对侵略，保衛和平的偉大努力

黎巴嫩的人民起义，特别是伊拉克人民革命的成功，是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发展和偉大胜利。中国人民对黎巴嫩人民武装反抗美英帝国主义

走狗夏蒙卖国集团的斗争，一开始就表示了真诚的同情和支持；对于伊拉克共和国的诞生，更是热烈地欢呼祝贺。我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苏联，是最先承认伊拉克共和国的三个国家。对于美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东；军事干涉黎巴嫩人民武装起义和侵入约旦，企图进一步侵略伊拉克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战争挑衅，我国和苏联都强烈地表示了绝不能袖手旁观，坚决要求美英帝国主义从中东撤兵。社会主义国家对中东人民，以及对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侵略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一贯给予深切的同情和不遗余力的支持，因为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应有的态度。因此，最近中苏两国首脑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这次震动世界的会谈进一步表示了我国和苏联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态度，对帝国主义强盗再一次提出严厉警告。在会谈公报里，严正地表明“中苏两国坚决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为了竭尽一切可能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坚决主张尊重中东各国人民有选择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自由权利，会谈公

报还坚决主张立即召开大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中东局势，并且坚决要求美国 and 英国立即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他们的军队。八月五日赫鲁晓夫同志写信给美、英、法三国政府首脑，建议在美英两国多方阻挠大国首脑会议举行的条件下，立即召开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以便促使美英两国侵略军立即撤出黎巴嫩和约旦。七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苏联代表团请求，召开了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会上苏联代表索波列夫严厉地谴责了美英帝国主义对中东国家的武装侵略，并要求美英两国立即命令它们的侵略军撤出中东。由于苏联代表的努力，会议决定于八月八日召开联合国大会的紧急特别会议。但是，应该指出，目前美英帝国主义在中东还继续扩大侵略和发动新的战争冒险，“世界仍然没有免除中东冲突尖锐化的危险”（索波列夫）。所以，我们在作出各种和平努力的同时，还必须对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必须有充分的信心和决心来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这正如会谈公报所严正表示的：“如果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竟敢把战争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末，所有爱好和平和爱好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必将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彻底消灭帝国主义侵略者，奠定世界的永久和平。”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工作大跃进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经过整风运动特别是批判了中游思想之后，积极性大大提高，人人决心力争上游。最近，为迎接广东分院系统在八月中旬举行的跃进大会，各研究室纷纷提出挑战，要自七月下旬起，苦战廿天，拿出研究成果，向跃进大会献礼。

该所哲学研究组决定要整理和撰写论文和资料三十万字，其中有“陈白沙的哲学思想”（初稿）、“明清两代广东思想家简介”、“大跃进形势下的农民思想”（论文）、“农业技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论文）和“实践出哲学”（论文）等共六个项目。历史研究室提出：在没有高级研究人员指导下，苦战廿天，除完成“1899年遂溪人民抗法斗

争”和“佛山手工业调查”两个资料以外，并要完成“1921—1927年广东人民革命大事记”、“红巾军史料”和访问革命老人，整理出资料第一辑等七个新项目。经济研究室决定要完成下列论文及资料编辑工作：“斥现代修正主义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诡辩”（论文）、“广州市蔬菜市场研究”（论文）、“战后香港主要经济资料统计”（初稿）和“香港经济简介”（初稿）。民族研究组则提出：为编写民族简史简志，要收集和整理资料（连同过去调查的材料六十万字）共一百万字；就现有研究人员平均计算，要每人写出有关民族问题的论文一篇，其中有“海南黎族合亩制社会性质”和“批制马寅初新人口论”等七篇共约七万字。（天）

銳利的武器

——介紹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

村人

馬克思主义是在同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反动思潮作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編入“反对机会主义”文集的，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写的几篇主要論文和书信。

机会主义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現。不論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机会主义，或后来列宁所反对的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以及今天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正在批判着的現代修正主义，它們所販賣的都是一路貨色。編入文集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著作，不仅告訴我們在那时的各种机会主义的錯誤的實質，而且，还告訴我們怎样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調和的斗争。因此，学习馬克思、恩格斯这些著作，對我們認識与批判現代修正主义，是有极其現實的意义的。

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他們的革命活动，便同时开始了与机会主义的斗争。編入本书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克利盖的通告”这两篇文章，就是他們为了反对小資產階級思想体系的所謂“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作的。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階級根源和反动實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謬語，抹杀尖銳的階級斗争，用高談闊論来代替革命斗争。他們同剝削者妥协，向反动思想認媚。在批判这些錯誤思想的同时，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关于階級斗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說。

虽然馬克思、恩格斯在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作斗争中給小資產階級的空想观点以彻底的批判，但是，在当时共产主义同盟的各組織中，特別在巴黎，小資產階級的影响仍然很强烈。1846年8月，恩格斯被派到巴黎。在那里他与蒲魯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恩格斯写給布魯塞尔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的三封信反映了这一斗争的情况。恩格斯揭穿了格龙——蒲魯东主义的反无產階級的、小資產

階級的、落后手工艺工人的性質。他指出，共产主义只有通过暴力革命而不是通过手工业者組成联合会的办法达到的。后来，恩格斯又在他所写的“論住宅問題”一书中对蒲魯东主义进行了尖銳的批判。編入本文集的“論住宅問題第二版序言”，对蒲魯东主义者圍繞着住宅問題而发表的謬論作了有力的批判。

編入本文集中的論文和书信，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馬克思、恩格斯对拉薩尔派及其遺毒作斗争的文件。拉薩尔是十九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馬克思、恩格斯和他之間在許多原則問題上，例如在国家問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問題上，有着根本的分歧。他們很早就同拉薩尔展开了无情的斗争，一再指出拉薩尔的荒謬。可是，拉薩尔派的傳統已經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扎下了根，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对拉薩尔的遺毒进行长期的斗争。編入本文集的一部分論文和书信，反映了这一斗争。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的声明”及1865年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和給庫格曼的信，就反映了这一斗争的情况。馬克思指出：“拉薩尔事实上叛变了党。他跟俾斯麦訂立了一个真正的契約”^①（馬克思、恩格斯当时还不知道拉薩尔和俾斯麦談判的事实，这事实一直到1928年发现拉薩尔給俾斯麦的信时才知道；但是，馬克思已經看到拉薩尔的叛变），拉薩尔分子“施书澤是不可救药的”。^②他們認為必須与拉薩尔派决裂。

“哥达綱領批判”也反映了馬克思、恩格斯与拉薩尔的遺毒的斗争。在1875年以前，德国工人运动中有拉薩尔派和爱森納赫派。由于立場的不同，

① 見文集第122頁

② 見文集第117頁

兩派之間不斷地展開尖銳的鬥爭。當時，愛森納赫派是比較正確的，而拉薩爾派則是反動的。但是，愛森納赫派在不少問題上表現出立場尚不夠堅定。德國社會民主工人黨（愛森納赫派）的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報”發表醫學博士米爾柏格關於住宅問題的一系列反動文章，就是他們理論上幼稚的一個例子。馬克思、恩格斯常常糾正他們的錯誤。在1875年，當拉薩爾派與愛森納赫派合併時，儘管馬克思、恩格斯再三地警告愛森納赫派的領導者，特別是李卜克內西，叫他們不要追求“不惜任何代價”的統一；但是，李卜克內西的調和主義的狂熱仍舊占了上風，他們提出了一個向拉薩爾派作原則性計步的兩黨合併的綱領草案。當馬克思、恩格斯突然得到這個草案時，立刻向愛森納赫派的領導者表示了最堅決的抗議，並對綱領草案作了全面的批判，這就是著名的“哥達綱領批判”。

“哥達綱領批判”是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件之一。在這裡，馬克思堅決地反對與拉薩爾派的無原則的妥協，反對離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企圖，反對對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歪曲，同時，進一步發展了科學的共產主義的原理。他對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問題、共產主義的兩個階段——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問題，都作了科學的分析和論證。附在這裡的恩格斯給倍倍爾的信，對綱領草案的錯誤也作了批判，其中特別尖銳地抨擊了在国家問題上的機會主義糊塗思想。列寧認為，這是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國家問題的著作中最精彩的議論。

“哥達綱領批判”一直到1891年才發表。當時，機會主義分子又積極活動，拉薩爾主義思想又復發了，如果不給予沉重的打擊，就可能影響到將在1891年愛爾福特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用以代替哥達綱領的綱領草案，因此，恩格斯極力主張發表它。“哥達綱領批判”的發表和恩格斯為“法蘭西內戰”作的導言，是向機會主義陣營投擲的兩枚炸彈。同時，恩格斯還在批判1891年綱領草案時，給機會主義以猛烈的攻擊，堅決地捍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馬克思、恩格斯對巴枯寧主義的鬥爭，也反映在編入文集的一些論文和書信中。恩格斯在給國際工人協會西班牙聯合會的信中，說明了巴枯寧主義者所宣傳的不要過問任何政治的錯誤和危害性，同時指出，要使工人階級從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舊政黨的統治中解脫出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各國建立

無產階級的政黨，由這個黨來執行獨立的政策，以達到解放工人階級的目的。在“松維爾代表大會和國際”、“論權威”以及給科·切爾札吉的信中，恩格斯就巴枯寧主義者對權力、權威、集中和紀律的進攻，作了徹底的批判。

在馬克思、恩格斯致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以及馬克思致左爾格（1879年9月19日）、恩格斯致倍倍爾（1879年12月16日）等信中，馬克思、恩格斯對“蘇黎世三人團”——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所寫的“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回顧”一文，進行了最尖銳最致命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這些傢伙所堅持的露骨的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的觀點，同時也反對德國黨的領導所暴露出來的對這些機會主義者的調和主義態度。

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繼續與機會主義作鬥爭。他堅決地反對1884年成立的費邊社。在給考茨基（1892年9月4日）和給左爾格（1894年11月10日）的信中，他指出費邊社的資產階級性質，揭露他們害怕革命，反對階級鬥爭的反動觀點。

馬克思、恩格斯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給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對於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不論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還是蒲魯東主義，是巴枯寧還是拉薩爾，馬克思、恩格斯都堅決和它們進行毫不調和的鬥爭。機會主義者打着社會主義的旗號，混在無產階級隊伍中間，對工人運動起着瓦解的作用，因此，必須堅決揭露他們的真面目。拉薩爾分子施書澤曾經要求馬克思不要公開批評拉薩爾派，馬克思說：“我不能答應你，我不以個人名義在報上公開批評拉薩爾派的偏見（就象以前我對蒲魯東主義者所做的一樣），當我認為為了工人運動的利益，這是絕對必要的時候。”^①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和機會主義作鬥爭，是“完全符合於一般的辯證發展規律的”，^②是完全符合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規律的。對於那些對機會主義鬥爭表示動搖的人，馬克思、恩格斯指責這是“腐敗氣味”，而表揚和支持那些堅決投入鬥爭的同志。

有人擔心展開對機會主義的鬥爭會不利於團結，會引起分裂。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這種憂慮是不必要的。恩格斯說：“不要讓‘團結’的叫囂把

① 見文集第133頁

② 見文集第170頁

③ 見文集第154頁

自己弄糊涂了。那些最常喊这个口号的人，恰好正是引起不和的罪魁”。他們指出，在可能團結一致的时候，團結一致是极好的事，但还有比團結一致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原则。沒有馬克思主义的共同观点，就沒有團結的基础。我們决不能同那些把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銷的人一起行走。因此，分裂并不可怕，甚至是好事。恩格斯說：“一个政党情愿去实行分裂并且經得起这种分裂，就証明它是有生命力的。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經過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①如果我們企图抹煞业已成熟的分裂，很可能給机会主义利用社会主义的招牌去干更愚蠢更齷齪的勾当。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搞臭机会主义，才能在新的基础上有更巩固的團結。

有人担心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会給敌方一个武器”，恩格斯說：这“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誹謗当然是借任何理由都可以散布的，但是一般讲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評使敌方极为惊异，并使他們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能自己給自己奉送这类东西的政党該具有多大的内在力量呵！”^②敢于对机会主义作斗争，正是共产主义运动力量强大的表现。

事实証明，所有的忧虑都是不必要的。我們必須学习馬克思、恩格斯这种“毕生与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做斗争，并且比反对任何別人都要猛烈”^③的精神，与以南共领导集团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义作不調和的斗争。

現代修正主义不是別的，正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机会主义，它們只不过是从早已被馬克思、恩格斯搞臭了的机会主义毛坑里拿出来的貨色。

馬克思、恩格斯早已指出，机会主义将为历史所抛弃。而历史事实也已証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断言——工人运动中的一小撮可耻的叛徒，只得个遺臭万年。同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过的机会主义比較起来，現代修正主义的面目更丑恶，所处的地位更不美妙。現代修正主义的出現，反映了帝国主义的临死的掙扎。帝国主义灭亡的日子已經不远了，靠帝国主义养活的現代修正主义者的命运难道会比帝国主义好些嗎？

① 見文集第156頁

② 見文集第67頁

③ 見文集第173頁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招考研究生

为了加速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培养出一批又紅又专的中級高級的研究力量，經中共广东省委批准，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决定在今年招收一批研究生。包括哲学、經濟、历史、民族四个专业。

在哲学方面，共有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自然辯証法和邏輯等四个专业；历史方面共有中国近代史，中国現代史和史学理論等三个专业；經濟方面共有港澳华侨东南亚經濟研究，社会主义經濟問題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問題三个专业；民族方面則有民族問題的理論与政策，民族学和民族史三个专业。

該所所招考的研究生主要条件是：（一）凡具有文化程度相当于大学水平、有科学研究工作能力或有志于研究工作的国家机关、企业科級以上的干部；（二）高等学校本科毕业或有同等文化程度、具有三年以上科学工作、教育工作、財經工作或其他工作經驗，并具有科学研究工作能力的干部。

該所培养研究生的方法是貫徹边学边干的精神，被录取的研究生将参加各該专业室組的研究或調查工作，并按工作和各自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科学院規定办法，評定正式职級。在学习期間則暫按原服务机关的工作級別同等待遇。

短论与随笔

阿拉伯人民的誓言

蕭明父

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的阿拉伯世界，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世界。据说，穆斯林见面时就是用“我对你表示和平”这一词句来互相致敬的。它成为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共同语言。这种和平的愿望和信念，也表现在古兰经上：“你们不要侵略，安拉的确不喜爱侵略的人”，“倘若他们倾向和平，你就当倾向和平”。

可是，从人类出现了恶魔——帝国主义强盗那个时候开始，阿拉伯人民的这种和平愿望，就遭到帝国主义者的军靴的无情践踏。自然，热爱和平的人同样懂得怎样捍卫和平，正如古兰经上说的：“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在那里发现他们，就在那里杀戮他们；并将他们逐出境外，犹如他们从前驱逐你们一样。”遵奉着古兰经的经义，阿拉伯人民为和平而流血。从此，在地中海东岸，在幼发拉底河两岸，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帝国主义强盗在这些土地上点燃了仇恨的火种……

俗语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恶魔们既然在阿拉伯世界点燃了仇恨的火种，就总有一天要葬身在阿拉伯人民的仇恨的火焰之中。当英法帝国主义强盗侵入苏彝士运河的时候，埃及人民把他们打得喘不过气来；当美帝国主义强盗的魔爪伸进叙利亚的时候，大马士革的爱国者就把它斩断。现在，大洋彼岸和英吉利海峡的强盗，又结伴侵入黎巴嫩、约旦和利比亚，在这里等待着他们的，不是别的，正是那燃烧着的仇恨的火焰。

——在贝鲁特，有一个穿着橘黄色衬衫的十多岁的黎巴嫩小孩，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美军登陆，

他用阿拉伯语发誓说：“我们是阿拉伯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回去。”

——一个叫做阿里的年约二十岁的黎巴嫩学生在市中心区看到美国兵横行霸道，对他的朋友说：“我们还能忍受被美帝国主义占领下的国家生活吗？我们是阿拉伯人！”

如果以为这只是一个十多岁的黎巴嫩小孩的誓言，或者只是两个黎巴嫩学生的对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这是阿拉伯人民的誓言。这一誓言，已经叫闯进阿拉伯的强盗们“胆战心惊”。

看来，报道这条消息的美国记者先生，比起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麦克米伦和苏埃德之流要清醒得多，不是吗？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学懂“当你进去以前，先想想能不能出来”这句阿拉伯谚语。他们进去了，现在还在继续进去，但是，他们就是没有想想能不能出来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在给美国国会的咨文中，说他之所以必需在中东采取战争冒险的行动，是考虑了夏蒙集团提供的情况和请求而得出的“清醒的结论”。其实这不但不是什么“清醒的结论”，而且是俗话所说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如果不及早勒住马缰，唯一的结局，必然是“盲人”和“瞎马”同归于尽。

真正“清醒的结论”是有的，只是做结论的人——譬如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吧，必先服一服“清醒剂”，那就是听听发自那个黎巴嫩小孩的阿拉伯人民的誓言。

最拙劣的魔术师

于燕郊

除了天真的不懂事的小孩子，誰都不会相信魔术师的戏法，因为任何魔术都是假的。只不过高明的魔术师能够把他手里的工具耍弄得有声有色，叫人一时真假难分。而拙劣的魔术师玩的戏法，则破绽百出，让人一眼就看穿了。美英侵略者出兵中东，侵入黎巴嫩和约旦的根本站不住脚的借口和贼喊捉贼的诡计，就是那种最拙劣的魔术师的戏法。

不管是黎巴嫩人民反对夏蒙政权的武装起义，还是伊拉克人民推翻费萨尔王朝的伟大胜利，都是黎巴嫩人民和伊拉克人民自己的事情，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这不仅是国际上公认的道义，而且也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美英侵略集团既然象艾森豪威尔所宣称的“认识到”他们“现在正在采取的步骤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又没有胆量承担这种“严重的后果”，也就只好胡诌什么他们出兵中东，是为了保护美国侨民，为了维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独立(麦克米伦则称之为“预防性措施”)。这样，艾森豪威尔这位最拙劣的魔术师，就在世界人民的面前，表演了他的破绽百出的可笑的戏法。

是不是在黎巴嫩的美国侨民发生了什麼危险呢？不！且看看还处在夏蒙政权控制下的黎巴嫩会议议长奥塞兰怎样描述黎巴嫩美国侨民的近况：自从起义爆发以来的过去六十五天中，美国人的生命和利益从来没有受到威胁。而艾森豪威尔这一借口之可笑，还表现在他根本无法回答苏联政府对此提出的严厉质问：怎样的国际法准则允许外国为了这一目的派遣自己的军队到别国境内去？确实，这一问，就把艾森豪威尔问得哑口无言了。

是不是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独立遭到了什麼危险么？也不！就是连那个原来就是要为美国寻找干涉的根据而到黎巴嫩进行调查的联合国“观察团”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也不能不承认根本不存在什麼黎巴嫩“领土完整和独立”遭受威胁的情况。

现在，事态的发展，更把这些最拙劣的魔术师

弄得丑态百出了。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之流的海盗行动，在中苏两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愤怒的抗议和严厉的谴责之下，更加坐卧不安起来了，因此，他们又在变新的戏法：说什么美国这次出兵中东地区，是为了协助一个“遭到外来间接侵略”的小国。

还是用艾森豪威尔自己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七月十六日——美国出兵中东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在向全美广播演说的时候宣称，美国所以要出兵中东是因为“在伊拉克一个组织得十分严密的军事行动推翻了依法组成的政府”；而“黎巴嫩这个小国将近两个月来也一直在进行内战。”既然是伊拉克人民推翻本国政府，既然在黎巴嫩进行的是内战，哪来的“间接侵略”呢？

这里，艾森豪威尔这个最拙劣的魔术师显然是在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那么，到底真情何在？

另一个同样拙劣的魔术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几个月前耍的另一套戏法，露出了一个破绽。他说：“自由的欧亚地区和非洲在经济上几乎完全依靠近东的石油……因此，如果美国不立即行动的话，它就绝不能履行上帝所赋予它的领导自由世界的崇高使命。”既然石油是美英侵略集团的“依靠”，那么，当黎巴嫩人民起来反对卖国的夏蒙政权，当伊拉克人民建立了反帝国主义奴役的政府的时候，受到威胁的正是美英垄断资本家的钱包——占全世界蕴藏量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五的中东石油，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所要保护的也正是这个血淋淋的钱包和他们在中东的战争基地。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个被历史事实所一再证明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是任何魔术师都歪曲不了的——象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那样拙劣的魔术师，在这个真理的面前，固然无能为力，就是贝尔格莱德的自以为高明的魔术师们——现代修正主义者当场出丑了。

“中游”与懸崖

希 梁

在一些知識分子中，流傳过这样一种看法，即：“业务力爭上游，政治甘居中游”。他們的口号是“談起业务我冲鋒，提到政治我居中”；“业务要做鸡中鶴(鶴立鸡群的意思)，政治不当鶴中鸡”。

所謂政治甘居中游是什么意思呢？他們說“上游不想爭，下游不敢当”，“不偏右，不过左，两头照顧”，“当左派，太辛苦，当右派，人唾弃，当个中間派，最愜意”。据說持有这种“政治居中論”的同志也有他的难言的“苦衷”：出身不好啦，历史上犯过錯誤啦，“家庭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只好安于“紅不透，白不了”的中間状态。

这里，需要解决三个問題：什么才算是政治的上游？个人的政治状态能永居中游嗎？政治甘居中游，能否力爭业务的上游呢？

看来有些同志把政治的上游简单地理解为能否入党的問題。这是一种很片面的認識。具备不具备条件入党，可以說是政治上是否上游的一种标志，但这絕不是唯一的标志。有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是否坚定地站穩了无产阶级的立場，是否树立了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在自己的工作中，政治是否挂正了帅，是否确立了馬列主义的世界觀——辯証唯物主义思想，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衡量人們政治上处于什么状态的尺度。如果衡量的結果是肯定的，也就是政治上处于上游了，而这样的政治上上游，却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其所以有人不想、不愿在这些方面力爭，那是因为他们脑子里还撥弄着个人名位的小算盘，并想通过“捷徑”来尽快地满足个人的名利欲。至于历史上犯过錯誤，出身于剝削阶级家庭的人，就更應該在政治上把定舵，背叛原来的阶级，在实际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場，如果“裹足不前”，不坚决改造自己，岂不是“一錯再錯”嗎？

那末，个人的政治状态能否永居中游呢？从絕

对位置來說，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或則进而为上游，或者退而为下游，沒有永居中游之理；从相对位置來說，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的时代，力爭上游已經成为人們工作、学习、生活的指导思想，原来是下游的要力爭上游，原来是中游的也要力爭上游，原来就是上游的更要力爭再上游，这样，甘居中游的結果，必然退到下游。因为人們都往前赶了，你却在原地踏步，怎能不給摔在老远的后头呢。何况作为一种政治状态，不左則右，根本不存在什么中間状态。有一些政治上甘居中游的人，他們自供对学习政治是“三分勉强、七分应付”的，“买政治书籍，几角錢都感心痛，买业务书籍，几块錢也无所謂”的。連政治学习尚且不那么感兴趣，他們能用什么东西来使自己的思想跟得上大跃进的形势呢！要想居“中游”，实际上已是“下游”了。

至于說在政治甘居中游的情况下，力爭业务上的上游，实质上是把政治与业务、紅与专对立起来。政治是統帅，只能是以虛帶实，以紅帶专，才会使业务有个正确的方向，干起工作来才会有信心和勁头，不走或少走弯路和不出或少出差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单求业务上游的人，大概都有一种迷信思想：过高估計个人的业务能力。他們自認对某一专业是有“本錢”的，不要領導，不要群众，政治不挂帅也能够搞出“名堂”来。而推动他們业务力爭上游的，不是別的东西，正是个人主义的欲望，用搞出来的“名堂”向党、向人民討价还价，要名要利。因此，所謂“业务力爭上游”云云，說穿了不过是那种“只专不紅”的貨色。还應該指出，政治上不力爭上游而希图在业务上有所成就，这叫做緣木求魚，枉費心机，無論如何是达不到的。到那时，对党不滿，对社会不滿，“甘居”的恐怕就不是什么“中游”，而是十分危險的懸崖了。



巧妇可以作“无米之炊”嗎，

理論与实践第七期上发表的戈楓同志的“談思想解放和思想工作”一文，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它闡明了自卑心理和迷信思想必須打破。

但是，戈楓同志在強調解放思想的时候写道：“社会主义建設高潮的时代，巧妇是可以作无米之炊，是可以异想天开的，问题是；你敢不敢，有没有勇气”。我认为戈楓同志的这种精神和愿望是好的，使讀者大胆地解放思想，不受任何常規所束縛，但是这里很容易使人走上脱离实际的道路。我們知道：用同样的米，因技术的巧拙不同，动脑筋、找窍门、想方法的不同，做出的飯一定会有好坏之分，因而我們一切工作需要这样的“巧妇”，

要求同別人用同样的“米”，“炊”出比別人更好的“飯”。这就是說，米是作飯的原料（物質），沒有米妇再巧也是不能作成飯的。（当然无米只要有别的原料还是可以做东西吃的），因此，我觉得戈楓同志的“巧妇可以作无米之炊”的提法与他自己说明敢想敢說敢干的前提应当是“求实的精精神”的提法是极矛盾的。

湖北省政治学校 胡子华

答胡子华同志的質疑

“巧妇难做无米之炊”，这是中国一句老話。意思是說，再巧的媳妇，无米也做不出飯来。这句话本来是不錯的，沒有米怎么能做出飯来呢？

但是，在各项工作大跃进的今天，有的人却把“巧妇难做无米之炊”这句老話，当作自己暮气沉沉，甘居“下游”的一种遁辞。工作中一迂到困难，就“就此止步”；如果要他繼續前进，他就首先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讲一大頓所謂困难，然后就是要求領导上帮助解决。領导上帮助下級解决困难，这是責无旁貸，完全应当的。问题是首先要主动想出办法，克服困难，創造条件。但是，这种人不是这样作的；他們老是抱怨說：“巧妇还难做无米之炊，你沒有那个条件，叫我有什麼办法！”乍一听，似乎也很有道理；做什么事，如果不具备条件，而硬是要做，这怎么成？这不是唯心論，主观主义嗎？因此，有的人就不免要为那些“巧妇”、“巧夫”們同情一番了。

对“巧妇”、“巧夫”們的論調，我也曾有过“同情”。不过，后来在实际工作中，感觉这种說法有很大的消极作用。我想：一个媳妇只是当別人把米給她摆在面前，她才会生火做飯，这还算得什麼“巧妇”呢？这岂不是連“笨妇”也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嗎？！所以，在我給七月号“理論与实践”杂志写的“談思想解放和思想工作”的一文中，曾有这样的写法：“巧妇是可以做无米之炊”的。

这意思就是說：既是一个“巧妇”，当自己

“无米”的时候，就应当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去弄点米来煮飯；确实“无米”，但有面粉、或有其它粮食，如番薯等，还是可以“炊”的。为什么一个“巧妇”还那样的死心眼，非米不炊呢？！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說一个沒有米的空鍋子能够煮出飯来。胡子华同志也許正是在这一点上发生了誤解。

现在，在我們不少的工厂、企业中，的确涌现了不少的“巧妇”、“巧夫”或巧男、巧女，他們的确做了“无米”之炊。如有的工厂或手工业合作社，他們并没有什么技术設備力量，但是，他們炼出了鋼鉄，做出机器来了。又如，做机器本是要用鋼鉄的，但有的用陶磁也做出机器来了。又如，造酒过去是要粮食的，现在泥巴（观音土）也造出了酒。这些事例，是举不胜举的。这些都可以說是巧妇做了无米之炊。当然，这在那些把“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的“唯条件論”者看来，是从来未敢想过的奇迹，而这些奇迹还将会不断地涌现。有的科学家不是已經在設想从空气中取鸡蛋和面包了嗎？这些奇迹不断地涌现，必将使那些“唯条件論”者目瞪口呆。

我們反对待米而炊的所謂“巧妇”，反对“唯条件論”。但是，是否就是提倡或是否就可以一切都不要条件了呢，就可以想入非非、胡思乱想了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样，那就未免近于荒謬了。我們証唯物主义者，因此，敢想，絕不等于凭空瞎想。这应当是不成为問題的吧？（戈楓）

关于現代修正主义的几个問題

編輯同志：我們在学习批判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义的文件时，碰到一些問題，虽然曾經組織过漫談，但思想上还很明确，請帮助我們解决。我們要求解答的問題如下：

- (一) 現代修正主义有那些特点？
- (二) 为什么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在思想方法上是用詭辯代替革命的唯物辯証法？
- (三) 为什么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在政治上是用反动的超階級的国家論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論？
- (四) 为什么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在政治經濟学上是为壟斷資本辯护？

瀟江 張化文 1958年6月15日

解答：現代修正主义是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綱領草案”为代表的現代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反动的资产階級思潮。就它的思想本质來說，同旧的修正主义是一致的。

十九世紀末叶，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階級与资产階級之間的矛盾尖銳化，随着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广泛流傳，资产階級就力图瓦解工人階級的斗争意志，但是只靠资产階級的“理論家”，已經无能为力了。因此就要利用工人运动内部的修正主义，就象列宁所說的“馬克思主义在理論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换了一套馬克思主义者的衣衫。”（“馬克思学說的命运”）臭名远揚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領袖埃·伯恩斯坦，就是在这个时候披着馬克思主义的外衣出現的。伯恩斯坦从资产階級的立場反对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要求放弃工人階級的革命斗争，放弃无产階級专政，宣揚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伯恩斯坦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向馬克思的辯証唯物主义和唯物辯証法大举进攻。伯恩斯坦在政治經濟学上否認馬克思的价值理論、资本主义积累的規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階級絕對貧困化与相对貧困化的規律，等等。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受到社会主义的所有敌人的喝采和欢迎。当时的莫斯科宪兵局长祖巴托夫就大力把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推荐为工人的讀物。

和伯恩斯坦同时的另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領袖考茨基，以及稍后的奥地利的魯·希佛亭，都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社会主义者客

观上是受帝国主义超額利潤收买，变为资本主义的看門狗和工人运动的破坏者的一部分小资产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某些阶层。”列宁对这些人物的评价是一針見血的。

以南共領導集团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义和他們的老师一样，企图“修正”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便为他們的主子——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效劳。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現以南共領導集团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义呢？我們从国际工人运动的整个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到，当国际工人运动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每逢历史发生急剧轉变的时候和在无产階級政党面前提出新問題的时候，无产階級的队伍中总要出現这样或那样的机会主义。因此，以南共領導集团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义的出現，是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反动势力又面临新的威胁：社会主义陣营的空前巩固，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胜利发展这一形势联系着的。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下，资产階級的“理論家”是早已破产了的，就是曾經为帝国主义卖过力的伯恩斯坦、考茨基、希佛亭之流的叛徒嘴臉，也早已被揭露无遺了。这样，国际反动势力就希图用收买社会主义陣营内部的好細的方法来达到他們的削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目的。这就是陈伯达同志所說的“鉄托集团的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現象，是現代国际階級斗争的产物，是現代帝国主义者——特别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的政策的产物。”

由此可見，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領導集团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义，除了具有与旧的修正主义同样反动的思想本质之外，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特点：

第一，現代修正主义是以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党的領導集团为代表，因此它有着更大的危险性；

第二，作为集反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之大成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不仅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綱領，而且是完整的系統的修正主义綱領，因此，它更具有代表性；

第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領導集团，是用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的美金豢养起来的，因此，它有着更大的反动性。

正因为如此，对于現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就更是必要，而且必須坚决地进行到底。

关于現代修正主义的特点問題，就談到这里。其他問題，因为篇幅的关系，只好下期发表。請你原諒。（于）

中东石油与帝国主义对中东的武装干涉

上 維

資 料

帝国主义不断对中东阿拉伯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进行武装干涉，危害世界和平，这是因为中东地区对帝国主义者具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与经济意义。中东地区的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直接与苏联南疆相接壤，而且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又是西欧和亚非地区之间航运的要道，美英帝国主义企图在这一地区建立一系列的军事基地，不仅用以统治中东各国人民，同时也企图以此为桥头堡，从南面封锁和进攻苏联。中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是帝国主义者重要的战争物资和经济掠夺的对象。这里只就中东石油资源和帝国主义集团对中东石油的掠夺情况，提供一些研究的资料。

据最近估计，中东的石油蕴藏量占资本主义世界已知的蕴藏量65.6%，约为168亿吨，相当于整个美洲和资本主义欧洲石油蕴藏量总和的两倍。在这一地区中，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巴林群岛的蕴藏量最多，其中又以科威特居第一位，那里的博阿油田，拥有超过全美国原油现有蕴藏量的三分之二^①；沙特阿拉伯次之。中东石油年产量占资本主义世界年产量的23%^②。1957年科威特的石油总产量达到57,286千公吨，是中东石油产量最多的地方；沙特阿拉伯达到48,363千公吨；伊拉克为21,704千公吨；伊朗为34,918千公吨。中东虽然蕴藏和出产着这么丰富的石油，但石油工业无论从开采、提炼、运输到销售，都被帝国主义控制和垄断着。实际上垄断着中东石油资源与生产的，是七大国际石油托拉斯：“新泽西美孚油公司”、“纽约美孚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得克萨斯油公司”、“海湾油公司”、“英荷皇家壳牌油公司”和“英伊油公司”。“英荷皇家壳牌油公司”是由英国和荷兰的垄断资本组成的，是西欧目前最大的石油托拉斯；“英伊油公司”是英国最大的石油托拉斯，也是中东牌子最老的外国公司。这七个大石油垄断公司中的其余五个，全是美国公司，而这五个公司实际上又是由洛克菲勒财团所控制，因为“新泽西美孚油公司”、“纽约美孚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是这一力量雄厚的财团的直属企业，而在“得克萨斯油公司”的资本中，洛克菲勒财团又占有可以控

制整个公司的股份，所以实质上也是洛克菲勒财团的一个子公司；“海湾油公司”虽属梅隆财团控制，但洛克菲勒财团也掌握有相当股份。

在国际垄断资本瓜分中东石油资源中，目前中东石油产区的面积和份额的分配，美国占64.5%，英国占20%，两者加起来就达84.5%。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群岛的石油开采完全由美国石油垄断资本控制着；科威特的石油开采，则由美国的“海湾油公司”和“英伊油公司”平均瓜分。此外，美国垄断资本还在“伊拉克石油公司”、“摩苏尔石油公司”、“巴士拉石油公司”和“卡塔尔石油公司”中占23.75%^③。在1951年伊朗实行石油国有化后，为了取代英伊油公司过去在伊朗的独占地位，1954年4月组织了国际石油财团，美国的五大公司又取得了40%的股份。总的说来，美国五大公司已控制了中近东整个石油开采量的大部份。英国石油垄断组织则占第二位，它们控制着伊拉克和卡塔尔石油开采的52.5%左右，科威特的50%和伊朗的54%。目前在中东地区的石油垄断资本，就1955年的情况来说，美国占总额的58.4%；英国占28.4%。荷兰只占7%，法国占5.3%，其他国家占0.9%。^④从上述的材料，可见美英两国特别是美国在中东石

① 引自“石油帝国”一书 第283页

② 见光明日报 58年7月24日第三版资料

③ 引自“国际问题译丛” 58年第1期第88页

④ 见光明日报 58年7月24日第三版资料

油工业中的势力是多么强大。

所有控制着中东石油的壟断資本，都获得了惊人的巨額利潤。为了壟断資本的利益，資本主义世界市場的石油价格，是根据美国国内墨西哥灣地区所开采的石油的价格外加運費来做标准的。但由于壟断資本对中东石油工人的特殊残酷剝削和中东石油产量多容易开采，中东石油成本很低，据美国联邦貿易委员会的資料，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生产成本，每一吨是1.96美元，科威特的是0.73美元，伊拉克的是0.58美元。但美国国内生产石油的成本却是11.50至12美元。这样巨大的差距，当然会給中东的石油壟断資本带来极其惊人的巨額利潤。据不完全的統計，仅仅1955一年，石油壟断組織在中东榨取的暴利即达18亿5千万美元，而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內，榨取的暴利則在80亿美元以上。①据美国参議員克弗維尔指出，开采沙特阿拉伯石油的阿美石油公司在1955年一年的利潤就达到2亿7千2百万美元。②“1955年美国 and 英国的石油壟断公司在近东开采了15,000万吨石油，总共只花了24,000万美元，这真是便宜得惊人，而他們在这批石油上获得的純利却达19亿美元，一年內就撈回了在这一石油地区的全部投資。又例如在科威特，他們在一个季度內所得到的利潤就等于整个时期在那里的全部投資。在美国，石油工业至少需要六七年才能把投資撈回来。”③正由于中东石油的利潤是如此巨大，使美国的洛克菲勒財团变成了世界上最有財有势的財团，使得石油壟断資本在美国自身形成一个石油帝国，支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并为了石油壟断資本的利益而直接危害着世界和平。

资产階級国家按其本性來說就是为资产階級利益服务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壟断資本集团就真正正成了资产階級政府的太上皇。在美国，八大財团实际上支配着整个美国的政治和經濟；以石油壟断利潤起家的洛克菲勒財团，又是这八大財团中最有势力的，它在近卅年来已发展得超过了过去曾經是美国最大財团的摩根財团。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是洛克菲勒財团一手扶植的，石油企业对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总统，給予了最有力的財政援助。当然，石油企业能够指望会得到艾森豪威尔政府同样的回敬。在艾森豪威尔的政府中，拥有着这样一些属于洛克菲勒財团的人物：国务卿杜勒斯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曾做过洛克菲勒五兄弟的辯护律师的艾倫·杜勒斯当上了中央情报局局长；有石油銀行称号的大通銀行董事长、洛克菲勒的女婿溫特罗普·阿尔德里奇被任命为駐英大使，以后又由美

孚油公司繼承人惠特尼繼任；得克薩斯州瓦根納石油业和畜牧业集团的經理和全国石油委员会委員罗伯特·安德逊被任命为海軍部部长，因为海軍部是全国最大的石油顧客；总统的“中东紧急委员会”主席是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副董事长科尔曼；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也曾当过洛克菲勒家族的財政金融顧問。不仅为此，洛克菲勒家族还亲自派出五兄弟之一的納尔逊·洛克菲勒去直接参加政府，作为这个財团在政治事务中主要的直接代表。納尔逊·洛克菲勒做过負責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森豪威尔的特別助理和改組联邦政府的特別顧問，他有权参加一切国家机密會議，并決定艾克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这一切証明，艾森豪威尔政府簡直就是“美孚內閣”。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根据之一就是要保护洛克菲勒家族的石油利益。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石油业的千依百順，使参議員克弗維尔慨叹地說：“本屆政府的官員已經养成习惯，每当石油公司吸了一口冷气的时候就会打喷嚏。”其实，不仅艾森豪威尔政府才是如此，华盛顿对中东的政策，一貫就必须首先服从石油壟断資本家的利益，也就是首先要服从洛克菲勒家族的利益。早在1947年提出“杜魯門主义”后，美国一位众議員赛尔德就这样說了：“……为了保护几家美英石油公司的利益，我們正在危及世界和平。”这真是对美帝国主义中东政策的最好注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資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中东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蓬勃展开。由于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形成与巩固，以及由于社会主义陣营对他們斗争的大力支持，給中东各国民族解放斗争带来了新的局势与更有利条件，大大地鼓舞了中东人民加强斗争的决心与信心。1952年7月納賽尔將軍领导的埃及革命的成功，更是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大发展。埃及成了中东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面鮮明旗帜。帝国主义者恨透了埃及以納賽尔为首的奉行民族自由独立政策和爱好和平的政府，千方百計要拔掉这面旗帜，企图重新奴役中东各国人民。但他們毕竟失败了，可是他們并不甘心。在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武装侵略埃及遭到彻底的可耻的失敗后，美国就立刻以所謂抵御“苏联渗入”为幌子，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来，这一方面固然是想繼續排挤英法势力，要“填

① 引自“国际問題譯叢” 58年第1期第87頁

② 引自“經濟研究” 57年第4期第150頁

③ 米高揚同志在苏共廿大的发言

补”英法势力在中东地区进一步被击退后的所謂“真空”，另一方面又阴谋繼續奴役和榨取中东各国人民。这带着极其濃重石油气味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实质上是洛克菲勒主义。

美国在中近东兜售艾森豪威尔主义，遭受到中东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尽管美帝国主义在伊拉克、黎巴嫩、約旦和土耳其找到了顧主，但这些国家的广大人民却以更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来回答帝国主义和他們本国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政府。黎巴嫩人民在今年五月发动了武装起义，目的正在于打倒一贯出卖黎巴嫩民族利益的亲西方的夏蒙政府、以便建立一个奉行民族独立政策的民主政府，驅逐帝国主义在黎巴嫩的势力。这就使得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十分恐慌。黎巴嫩虽不出产石油，但中东几条輸油管，大部分經過黎巴嫩，黎巴嫩的黎波里港和賽伊达港，就是三条油管的終点，因此美帝国主义一开始就对黎巴嫩人民的起义斗争进行干涉，同时又反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干涉”黎巴嫩，企图把黎巴嫩內政問題变成国际問題，以便进而再一次盗用联合国旗帜来替他的直接干涉黎巴嫩遮羞，掩飾其海盜面目。自伊拉克軍官于七月十三日晚上在伊拉克首都发动武装政变，推翻了作为美英帝国主义傀儡的費薩尔王朝，宣布成立伊拉

克共和国后，帝国主义更惊慌万状，因为这一个繼埃及1952年7月革命后的伊拉克革命，將給予帝国主义势力在中东的統治以更惨重的打击，它直接瓦解了巴格达条約。伊拉克的費薩尔皇朝是巴格达条約的倡議者，是美英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东的基石，因而費薩尔王朝的被推翻，奉行民族独立政策的伊拉克共和国的成立，就有特別重大的意义，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將得到更大的鼓舞，帝国主义在中东的石油壟断利益也就会受到更大的威胁。于是美英帝国主义就不顧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公然分別出兵侵略黎巴嫩和約旦，企图扼杀黎巴嫩的人民起义，扼杀新生的伊拉克共和国，維護約旦傀儡国王侯賽因的統治，并企图打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目的在扑灭中东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燄，繼續奴役和榨取中东各国人民，建立旨在进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的軍事基地，并燃起侵略战火。这就直接威胁着世界和平。

然而历史事实早已証明而且必将繼續証明：誰敢擋住历史前进的車輪，誰就要粉身碎骨！美英帝国主义不仅在中东的軍事冒險将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就連他們的石油壟断資本，也将在强大的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繼續不断高漲的怒潮下，最終遭到彻底的复沒。

苏联專家波伐良也夫来穗講学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近代現代史研究班苏联專家波伐良也夫教授曾于今年五月間来穗講学。5月2日在华南师范学院史政系作了“关于現代史分期問題”的專題报告，5月3日又对该系教师作了問題解答的輔導工作，对于巴黎公社失败的客觀前提，德国十一月革命的性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質，奥匈帝国的帝国主义特征，美国內战前夜南部奴隶制的性質以及苏联史学界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批判等，都作了詳細解答。

波伐良也夫教授在“关于現代史分期問題”中，对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世界現代史分期中給予了正确的应有的地位。专家将我

国人民革命胜利作为現代史第二阶段中第三时期的开始。专家指出：中国人民革命的偉大胜利更巩固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国人民革命的規模及意义乃十月革命后的第二个大胜利。专家說：这是現代史第二阶段的轉折点。因为中国革命胜利加强了世界和平民主陣营，壮大了社会主义而进一步削弱了資本主义。中国胜利不仅为中国經濟政治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說明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总崩潰开始了。

专家这个报告不但解决了世界現代史的分期問題，而且对于我国目前进行的中国現代史分期問題研究也有很大的启发。（瑞）



調查研究



乐东县番陽乡黎族合亩制(生产关系部分)調查

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調查組

編者按：关于黎族合亩制的性質問題，过去由于某些調查材料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特别是有关生产关系部分。有些同志就是根据这些片面的材料，对合亩制的性質，作出各种不正确的論断。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調查組的这个調查报告，关于这方面提供了比較全面的材料，有助于民族科学工作者对合亩制的性質問題，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特在这里发表，以供参考。

番阳乡屬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乐东县三平区，共有23个村，其中杞黎14个村，即万板、空透、抱隆、什茂、雅曼、什南、布倫、雅开（空加）、空套、毛农、毛主、毛或、才花、南打；僂黎8个村，即加艾、什艾、保力、巩入、空八、洪吐、坤步、开迈；苗族布倫1个村。共有745戶，2,740人，其中男1,249人，女1,491人。

番阳乡是黎族苗族的什居地。杞黎共有483戶，1,513人，其中男675人，女842人。一般以合亩为单位共耕农业，殘留原始共耕的色采比較濃厚。僂黎共有235戶，964人，其中男443人，女517人，都以一家一戶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苗族仅有27戶，163人，其中男81人，女82人，也是以一家一戶为单位經營农业。

番阳乡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是海南島琼崖縱队革命老根据地之一。1947年解放后，在这里建立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1949年撤銷，至1952年7月在乐东县城重新成立，后移迁保亭县通什市改为自治州），創办了琼崖公学。

番阳乡的黎族苗族人民，响应党組織起来的号召，1955年建立了互助組，1956年由互助組直接轉为高級农业社，現有毛主、空套、加艾、番阳等4个社。

在番阳乡，我們着重調查了杞黎的万板、空透、抱隆、什茂等4个村。解放前这4个村共有18个合亩，117戶（內有单干一戶），耕地777.9亩，每戶平均6.648亩，牛只149头，每戶平均1.28头；解放后共有21个合亩，130戶（內有单干一戶），484人，耕地578.2亩，每戶平均4.45亩，每人平均1.18亩，牛只158头，每戶平均1.215头。

农业是唯一独立的生产部門。此外还从事狩猎、捕鱼、紡織、編織等副业生产。副业生产一般都是在农闲时间进行。

农业生产工具主要的有：犁、耙、鋤头、鏟、手捻小刀等。解放前，耙是木質农具，其余都是鉄質农具。各种生产工具数量統計詳見下文。

鉄質工具的鉄制部分均由汉区輸入。解放前黎族人民尚未掌握熔鉄鑄鉄技术。至于鉄質工具何时

开始輸入，年代尚无可考，只从一些傳說中知道是很久以前的事。

农业生产以水、旱稻为主，此外还有番薯、玉米、木薯、烟草、葫芦瓜、南瓜、木瓜等。稻谷主要种植在旱田、水田上，其次是山栏地。旱田每年一造，水田每年两造。水、旱田的耕作解放前都是一犁一耙，只有秧田才二犁二耙；解放后普遍二犁二耙，56年后则普遍改为三犁三耙。解放前除秧田外没有除草施肥习惯，收割方法是用手捻小刀摘穗，只有王如清合亩在抗战胜利后开始使用镰刀收割。山栏地的耕作不适于使用犁耙，选好山地后，首先把丛竹小树砍倒，放火烧光，清除残枝后即可播种。播种方法是男子在前用尖木棒开穴，妇女随后点播种子。山栏地杂草易生，故播种后要除两次草。山栏地每年一造，种植两年后就要抛荒，另选山地。

男女性别间的自然分工，解放前是严格的；生产上的禁忌日甚多，到解放后特别是合作化以后已有了改变。

解放前番阳乡统称为番阳洞，设有洞长，大洞下又分六六个小洞，小洞设哨官，管辖几个村，村设头家，1932年改为团董，其后又改为乡保甲长。洞长、哨官、头家均系封建统治者委封，子孙世袭。洞长、哨官均由群众给他四亩或三亩旱田，并无偿替他耕种；他们调解洞内群纠纷，收取报酬，数量不定，有的严重地欺压和剥削群众，成为恶霸。

洞内成员间的关系，除尚有某些原始互助习惯外，地缘关系已代替了血缘关系，不存在全洞性的互相援助的义务。相反地，洞内甚至发生纠纷和械斗。

家庭组织，是包括父子两代的小家庭，家庭人口一般是三至五人。实行一夫一妻制。有妇女婚后不落夫家的习惯，未落夫家之前，可在娘家与别的男子“放寮”，（“放寮”就是男女间互找情人的意思。）往往生下头胎小孩后才回夫家，非婚生子，不受歧视，与亲生子同样看待。儿子婚后，等到妻子回来同居，便另建房屋和父母分居分吃自成一户。所谓“合亩”，就是由若干户这种父系小家庭组合而成。当然，合亩内除了包括父子、兄弟以外，有些合亩还包括有堂兄弟、侄儿或外来龙子等。亩头一般由辈份最长者充任，龙子不能担任亩头。

除了主要农业生产——水、旱田的耕作是由合亩共同进行外，副业生产，包括坡地、园地的种

植、饲养禽畜、编织、纺织等，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副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单位。

一、生产资料占有情况

农业是番阳乡唯一独立的生产部门，主要生产资料包括耕地、牛只以及农具，现将其占有情况依次分述如下：

1. 耕地（主要是水田、旱田；其次是山栏地；再次是坡地、园地。）

关于水田、旱田和耕牛的占有情况，详见附表一和附表二。

附表说明了：

（一）解放前什茂等4个村共有117户，耕地759.3亩，每户平均6.49亩；解放后共有130户，484人，耕地579亩，每户平均占有耕地4.45亩，每人平均1.18亩。解放后这4个村耕地减少的原因，是由于将4个村内几个恶霸的耕地分给四个村以外的其他各村无地或缺地的农民。

（二）在水田、旱田中，以旱田为主。解放前共有耕地759.3亩，其中旱田653.7亩，占耕地总数87.72%；解放后共有579亩，其中旱田551.1亩，占耕地总数94.34%。

（三）耕地所有制的形式基本有三种，即合亩内一户所有，合亩内几户所有和合亩内各户集体所有。解放前合亩内一户所有的为362.4亩，占耕地总数46.1%，合亩内几户所有的为102.9亩，占耕地总数14.46%，合亩内各户集体所有的为294亩，占耕地总数39.44%。解放后合亩内一户所有的为279.4亩，占耕地总数47.76%，合亩内几户所有的为61.9亩，占耕地总数10.79%，合亩内各户集体所有的为237.7亩，占耕地总数41.54%。不论解放前或解放后，合亩内一户所有的耕地已居主导地位，占耕地总数的二分之一弱。

（四）耕地占有的不平衡情况：

第一，从村与村之间来看，解放前什茂村共有47户，耕地297.2亩，每户平均6.32亩，万板村共有20户，耕地182.6亩，每户平均9.13亩，空透村共有22户，耕地90.1亩，每户平均4.44亩，抱隆村共有28户，耕地208亩，每户平均7.42亩；解放后什茂村共有45户，157人，耕地161.6亩，每户平均3.58亩，每人平均1.028亩，万板村共有22户，78

人，耕地145.2亩，每户平均6.862亩，每人平均1.94亩，空透村共有28户，105人，耕地126.8亩，每户平均4.52亩，每人平均1.206亩，抱隆村共有35户，147人，耕地145.4亩，每户平均4.154亩，每人平均0.994亩。

第二，从合亩之间来看，也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详见附表一、表二）

第三，从合亩内各户来看，每一个合亩亦同样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以解放前万板村徐新东父合亩为例列表如下：

占有者	与亩头的亲属关系	占有耕地（以亩为单单位）	占全合亩耕地总数百分比
徐新东父	亩头	59.8	55.96%
徐春平、青光、青有、阿妹	龙子	12.9	12.11%
徐青华父	堂弟	18.9	17.74%
徐阿磊	堂侄	14.9	13.99%
徐阿介	龙子		
徐阿珍	龙子		
徐奥恼父	龙子		
合计		106.5	

第四，从土地的集中来看，相当大的一部分耕地已为少数人占有，什茂村恶霸王如清占有92.4亩，万板村恶霸徐新东父占有59.5亩，抱隆村恶霸王公清占有41.6亩，这三个恶霸，共占有193.8亩，占万板等4个村耕地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不论是一户所有、几户所有或合亩各户集体所有，耕地所有权早已固定了。但一般来说，上述几种占有形式的耕地，都按习惯无偿地交由合亩共耕，产品按户平均分配。但有不少一户所有者和几户所有者把自己的耕地出租，地租也归土地所有者个人所得。

2. 牛只

万板等4个村解放前共有149头，每户平均1.28头，其中合亩内一户所有的81头，占牛只总数的54.36%，合亩内几户所有的20头，占牛只总数的13.42%，合亩内各户集体所有的48头，占牛只总数的32.22%；解放后共有158头，每户平均1.215头，其中合亩内一户所有的92头，占牛只总数的58.22%，合亩内几户所有的27头，占总牛只数17.72%，合亩内各户集体所有的39头，占牛只总数24.06

%。

3. 生产工具（见附表三和附表四）

附表说明了：万板村解放前农具共有铁犁85把，每户平均0.727把，铁锄98把，每户平均0.838把，铁镢114把，每户平均0.97把，钩刀162把，每户平均1.38把，木耙92把，每户平均0.78把，手捻小刀99把，每户平均0.85把，镰刀26把；解放后共有铁犁124把，每户平均0.953把，铁锄113把，每户平均0.87把，铁镢157把，每户平均1.2把，钩刀211把，每户平均1.62把，木耙107把，每户平均0.823把，铁耙9把。

农具和副业工具都早已为各家各户所有，由各户自己购买保管及使用。

二、阶级情况

（一）有关几个恶霸的材料

万板等4个村共有四个恶霸，即王明泽、王如清、王公清、徐新东父亲。

抱村隆王明泽 占有耕地20亩，任亩头，本人不参加劳动。政治上反动，曾任伪保，长处理群众纠纷，勒索高额的“报酬费”。有罪恶，有民愤。

什茂村王如清 曾任国民党伪中队队长、番阳乡伪乡长。解放后，带20多名娑罗逃奔万冲乡，屠杀居民3名，反动到底，罪恶累累。1952年被人民政府逮捕，判处死刑，同年在乐东枪毙。其罪行如下：

1. 掠夺耕地。共有耕地92.4亩，占全村耕地总数的30.975%。除继承父亲9.3亩外，其余83.1亩，都是通过夺掠和剥削而集中起来的。另外租入18.7亩。

此外，还占有耕牛15头，马5匹。占有犁9把，木耙12把，钩刀15把，斧头2把，手捻小刀12把，镰刀1把，锄头6把，铁镢8把，粉枪2支，铁抓2把。

2. 剥削工子。王如清自己不参加劳动，妻子的劳动也比别的妇女少。合亩的劳动，几乎全部由工子承担，家庭的劳动如养猪、看牛、酿酒、舂米、煮饭等等，也落在工子的肩上。

产品的分配权掌握在王如清一个人的手中，根本废除了按户平均分配的原则，成婚立户的工子王

祚令、王无乍两人，每年只分給他們很少一点谷子。其余的工子，甚至他的兄弟都不能享有分配的权利，他們沒有自己的稻谷，沒有自己的家庭副业，寄食在王如清家中。

王如清吃好、穿好、住好。他和两个老婆开灶，經常飲酒吃肉作乐。各种衣服、鞋袜齐备，而工子則沒有自己的家庭，住在寮房中，拾穿王如清遺弃的破衣服，沒有人身自由，不能自由离开，受鞭打是家常便飯。

此外，王如清还有高利貸及地租剝削（詳見租佃关系）。

抱隆村王公清 曾任伪乡长，为非作恶，民憤很大。解放后判处死刑。其罪行大致如下：

1. 掠夺土地、牛只。共有耕地42.4亩，占全村耕地总数的20.384%其掠夺的方式是：

填占兄弟的耕地27亩。父亲死后，遺留27亩耕地，本应由兄弟4人共同繼承，而王公清却恃势独占。利用处罚或其他剝削方式所得到的錢购买耕地共14.4亩。此外，牛只共有10多头，都是通过調解糾紛的所謂“報酬費”而获得的。

2. 无理处罚，或借調解名义，勒索“報酬費”。例如：抗战时，王大滔某日做工回来，經過王公清的盐仓，拿了他一点点盐，事后被王公清知道，便罰了他30个光洋及30斤重的猪一头。又如：四、五十年前，王公清和僂黎勾結，来到抱隆村，誣說王柏比偷了僂黎的谷子，又恐吓道：“你偷了谷子，明天僂黎将要来燒我們的村子。”这样王柏比被罰了牛四头，猪一条，鸡二只。

3. 填占公山。山上的藤不許別人砍伐，某次老兰等四人去砍藤，結果被罰了一头猪和三个缸。

4. 高利貸。高利貸的剝削很严重，年利50%，第二年未还，則利上加利。更严重的，是以少說多。王明章父向他借一个光洋，当他送回本利时，王公清板起臉孔，誣他借6个光洋，本利共12元。

5. 吞占“公家粮”。王公清沒有参加劳动，分配时又同样地得到一份。他的合亩公家粮占合亩年产量的 $\frac{1}{4}$ ，由他掌管，并占为已有，拿来放債，或者拿来购买耕地，扩大他的私有土地。

6. 商业剝削。雇工挑盐做买卖，每一小碗盐要換6把稻谷（約1斗）。

7. 地租剝削。据不完全统计，他出租土地共有13亩。地租一般都是40—50%，剝削严重。

万板村徐新东父亲 曾任伪保长，无恶不为，民憤很大。解放后判处死刑。

共占有耕地59.8亩，占全村耕地总数的

32.857%。其中出租了42.2亩，地租占40—50%，每年收租一百多担。他是亩头，操縱产品分配权，除每戶每年給3担稻谷外，其余的稻谷全为他独占。此外，他还持权无理处罚群众。

（二）龙子的种类、来源及其地位

除毛农、空加、雅曼三村沒有龙子外，其余11个村共49个合亩，347戶（外有单干5戶），其中，21个合亩有龙子54戶，占总戶数的15.27%。

黎語称龙公为fng，龙子为fat，前者意即有吃有穿，后者无吃无穿，簡譯为“富”“穷”。现将龙子的种类、来源及其地位，大致分述于后。

1. 出卖龙子。

为数最少，仅有4个，出卖原因：被处罚破产的占3个。如抱隆村王明貴祖父，原住才花村，不能如数繳清罰款，以4头牛出卖了自己。換牛作鬼者占1个。空透村張打紅曾祖父，原住万板村，得病需牛作鬼，迫得把儿子出卖給張亚文祖父作龙子。

出卖后，龙子移居龙公家，参加龙公合亩的劳动。未結婚成戶前，龙子沒有自己的家庭、牲畜、副业以及按戶平均分配的权利，只有在結婚成戶后，龙子才有自己的家庭，牲畜、副业以及按戶平均分配的权利。抱隆村王明貴祖父与众不同，仍留在自己原来的合亩参加劳动、分配，有自己的家庭、财产。不过，他有这样的义务，农忙时要帮忙龙公劳动，如犁田、耙田、捻稻、挑谷等，修建房屋谷仓时也要帮龙公劳动。

在4个出卖龙子中，有3个沒有耕地、牛只。如空透村張国亲自祖父起，在黄亮家里做了三代龙子，寬代村曹民承，在李冲家里做了30多年龙子，直到解放前夕也沒有自己的耕地、牛只。空透村張打紅是另一种情况，祖父繼承龙公的财产，分得2.8亩旱田，且可分享地租的收入。

龙子的财产，由自己的儿子繼承。如張打紅繼承了父产4.6亩的旱田。根据張竟仔說：“龙子能自由离开，但要在偿还卖身价之后。”事实上，沒有一个龙子离开过。

购买龙子，主要为了增加劳动力。張国亲祖父年輕力壮，是劳动能手，黄亮父亲看中了，便以若干稻谷买了他。

龙子結婚时，龙公杀牲备酒請客，帮助龙仔。如果发生战争，龙子要在前面打先鋒。

2. 投靠龙子。

数量最多，約20多人，将及全部龙子总和的一半。投靠龙公的原因：

主要是逃罰或被罰后破产。毛主席胡里权叔父，原住毛路乡，有一次，上山砍柴，僱黎×××誣說胡里权叔父在他山上砍柴，罰他15头牛，他出卖了耕地还不能繳清罰款，于是便投靠胡国与合亩做龙子。万板村徐亚农父亲，原住保亭县毛枝乡，有一次，毛道乡王老魏、王老寿制造事端，借故罰他13头牛，卖地繳付罰款后，家庭貧困，生活无着，投靠了徐拍磊亩头作龙子。其次，生活困难。如抱隆村王煥打父，原住什南村，飢寒交迫，日子难熬，投靠王老万父做龙子。

投靠龙公一般沒有送禮，个别少数却例外。如吳阿发祖父投靠空透村張亚砍祖父时，給龙公送一面銅鑼。

投靠龙公一般是自己个人投靠，个别少数是全家投靠。如布倫村馮沙排祖父被罰后，生活无所依靠，便携妻帶子投靠馮志孽祖父合亩做龙子。

投靠的龙子亦要移居龙公家，参加龙公合亩的劳动。如果是全村几个合亩的龙子，則由龙公們协商，把龙子分配在缺少劳动力的合亩，如王明貴祖父是抱隆村5个合亩的龙子，經大家协商后，把他分配在缺少劳动力的王大滔合亩中。

在20多个这一类的龙子中，一半以上沒有牛只，特别是耕地。有部分的龙子却占有自己的耕地，如万板村徐伯娘祖父，父亲共买了耕地9.6亩。从調查材料看来，第一代的龙子很少或者沒有耕地、牛只，到第二代或第三代才开始购买。

龙子购买耕地的财富通过什么手段来积累呢？出嫁女儿的聘金，聘金主要是牛只，而牛只又是购买耕地的主要媒介物。搞副业，养家畜。

龙子的财产由自己的儿子繼承，龙仔死时若无子，由兄弟料理丧事，其财产由兄弟繼承；如果由龙公料理丧事，其财产由龙公繼承，兄弟若要繼承，要償回龙公的喪葬費。

这种龙子一般能自由离开，有人身自由。寬代村曹鳴吉在30年前投靠曹亚佛做龙仔，过几年后，他便回白沙县毛貴乡，当家庭貧困，父亲病死后，又回到龙公家。空透村吳阿发祖父投靠張亚砍祖父

做龙子，四年多后也回去了。离开龙公后，仍保持着龙公龙子的关系，空透村張亚文祖父离开龙公时说：“今后我們还是兄弟，仍要团結，互相帮助。”

除个别外，都不拜認龙公的祖先鬼，但可和龙公的妇女放寮，結婚。

3. 收养义子。

約有10人左右，都是由父亲出卖的，原因有：被罰破产。如約在30多年前，王老元父亲被罰后破产，生活窘迫，寄食在毛或村王老发家中，当王老发的儿子死后，便把王老元卖給他作义子。生活困难。如抗战前夕，王亚农父亲因苦难的生活迫着他携子赴万板村謀生，时值王德球父亲无子，便把王亚农卖給他做义子。疾病。如王明享父亲生病需牛做鬼，便把他卖給抱隆村王老易祖父做义子。

收养义子主要是由于无子。义子都拜認义父的祖先鬼，且改为义父的姓氏，不能和义父有血緣关系的妇女放寮、結婚。按习惯义子有繼承义父财产的权利，亦可充任亩头。抱隆村王德易父死后无亲生的儿子，义子王明享繼承他的全部财产，并充任亩头；万板村王德球父死后，义子王亚农和亲生子王德球共同繼承他的财产，王德球年小，亩头由王亚农繼承，如果亲生子长大了，有能力充任亩头时，那末亩头还是由他优先繼承。

根据群众說，在付还卖价条件下，义子能自由离开，但事实上沒有一个义子离开过。

义子仍和亲生父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什茂村王亚农在农忙时，每年都有一、二次回亲生父家帮忙劳动，在平时，亲生父也会去探望自己的儿子。

4. 工子

共有7个，恶霸王如清有5个，王老发有一个，王里太有一个。

工子都沒有自己的家庭，不能搞副业，养家畜，除参加合亩劳动外，还要承担龙公家內一切劳动，工資又少。王邓貴在毛或村王里太父亲家做工仔，每三年仅有一头牛。恶霸王如清的工子，根本沒有什么报酬，龙公对他的剝削很严重，詳見恶霸部分的材料。

三、土地買賣、典當及抵押

至少在一百多年以前，土地已發生買賣。近幾十年來，由於被罰而出賣土地的事例日多。其他因飢餓或其他生活困難等亦有出賣土地的，但為數較少。如萬板村共轉讓了土地99.2畝，其中除9畝是直接被罰外，其餘的全部也是因被罰而出賣的。

合畝所有的土地出賣，須得到合畝全體畝眾的同意。幾戶所有的或一戶所有的土地出賣，由幾戶或一戶的所有主自己決定。出賣時，首先應賣給本合畝的人，如本合畝無力購買，就按血緣關係的親疏依次賣給同村的其他合畝、同遠祖的其他村，最後才賣給無血緣關係的人。

在買賣進行中，由買者備酒邀請村內畝頭，奧雅^①，本合畝的兄弟親屬以及賣田者全合畝的人，一起來喝酒。雙方在酒會上講好價格，即可成交。日後如有糾紛則由參加飲酒者作證。抱隆村在買賣中還“刻竹為憑”，將價格刻在竹簽上，然後砍為兩面，各執一面為憑。

土地買賣的價格，中等田每畝一般為二頭牛及五個光洋，上等田二畝為三頭牛及五個光洋。低於一般價格的現象也有，二畝中等田僅值一頭牛，甚至更低的價格。

這裡的典押，沒有嚴格的時間限制，大抵要在二年后才可贖回典押物，有時父親出典的東西，到兒子時才贖回的也有。

典押的價格一般是相當於出售價格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也有個別幾乎和賣價相同的。如陳開先父親五分田的典價則為黃牛水牛各一頭。贖典時，都是照原典價贖回，不論年限長短一概無息。

在典押關係成立以後，雙方還要刻竹為憑——拿一吋寬、五吋長的竹片，把典押的價格用鉤刀刻劃記號於其上（如典價為二頭牛，即刻二劃），然後由中間人（如無中間人，就由當事人的某一方）將竹片破開，出典人與受典人各執一半為據。日後贖典時，便以此竹片為憑合對，出典人歸還典價後，當場焚毀竹片，典押關係便宣告結束。

典押也可演變為買賣，如出典人在出典期間，要把出典物賣斷，征得受典人同意後，雙方協商，由受典人再付給賣主一些牛只或光洋，這樣土地所有權便永遠屬於受典人的了。

四、租佃

從調查的材料看來，租佃的發生至少已有一百年的歷史。當僂黎遷入番陽鄉後，租佃關係更為頻繁了。土地的租佃關係，發生在同村合的畝與合畝之間，或與別村合畝和個人之間，也有發生在杞黎和僂黎之間。當租佃雙方達成協議，租佃關係即告形成。

在租田時，雙方聯繫妥善後，佃者即殺雞、豬或牛去和田主達成協議。殺牲畜的種類不同，表示著租田年限的長短。按習慣：殺一頭牛——租九年；殺一條豬——租三年；殺雞（數量不定）或殺小豬——租一、二年。這並不因土地面積的大小、種類的不同或肥瘠程度的差別，而有所變更。如果租佃期滿，雙方同意繼租，便另殺牲來議定期限。到了後期，在租佃關係中，出現了中間人。解放前中間人大多是偽保甲長。中間人的職務是將租佃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在喝酒時對大家說清楚，並在日後監督雙方執行，此外中間人還要負責解決租佃雙方所發生的糾紛。中間人除參加飲酒外，可以從雙方獲得1—2個光洋的報酬。（不論租佃土地面積的大小和年限的長短，報酬相同。）

租佃關係的發展不平衡。萬板村共有耕地182.6畝，出租73.2畝，占全村耕地總面積的40.61%；抱隆村共有耕地208畝，出租28.4畝，占全村耕地總面積的13.45%；什茂村共有耕地297.2畝，出租28.5畝，占全村耕地總面積的9.43%。

出租土地一般都是上等戶，特別是惡霸戶，如萬板村惡霸徐新東父共出租42.2畝，畝頭徐阿湛共出租12畝，畝頭徐柏磊共出租8.2畝，徐青華父、徐阿磊二戶共出租8.8畝。承租者以僂黎為主，其次是杞黎內部，租地一般是少地或無地可耕的農

① 黎語沒有“典當”和“抵押”的詞匯，這裡是借用漢語的。據四十五歲的陳則先說，祖父時代已開始有了典押。近幾十年來，典押的情況相當普遍。典押的客體主要是土地。典押最初是由當事人雙方直接進行的，只要雙方同意，典押關係便宣告成立。後期出現了中間人，其產生原因及義務，與租佃關係中的中間人相同。但報酬是取決於典價的牛只數，每只牛收光洋一元。

② 奧雅，漢譯為老人，通常是對老人的尊稱。對偽鄉保甲長等也稱奧雅，但不帶尊敬之意。

民，个别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如恶霸王公清一面出租贫瘠低产地，一面又租进肥沃丰产地，恶霸王如清为了从工子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大量租地来耕，甚至把租地所有权占为己有。

收割前，租田者便通知田主前来分稻谷，田主亲自或派人前来监视。收割后，有的是先留下种子和当时田主及其随从者吃饭和饮酒所消耗的谷子给租田者，然后分为二份，租田者及田主各取一份。也有由田主按收成的好坏来决定田租多少的。

收租时，租田者要杀牲斟酒招待田主及挑谷者吃二餐，要是租田者因某种原因而不想继续租田时，他便对田主说，这是最后一次的请客，如果他还要继续租地，那末他将说：希望你第二年再来饮酒。同样，如果田主想继续出租，他便说：酒很好，菜很多，日后再来共饮，田也给你耕种。要是田主不满意，那他除了说酒菜如何如何的糟糕外，还干脆地提出收回租地，这样，双方的租佃关系便结束了。如未到期田主提出中断租佃关系时，要按习惯适当地给租田者以赔偿，多少则由中间人来协商解决。租田者提出中断的情况尚未发生过。

这里采用实物地租形态，地租一般占该地收获量的40—50%。附表如下：

注：根据毛道乡的稻产量平均计算，每把稻净谷重2斤零8钱。六把为一撮，六撮为一对，二对为一律，二律为一拇即144把。

解放前由于耕牛的缺乏，不少合亩和农户租牛使用。每头牛的租金，一般都为2个光洋，不论年期长短，但在个别情况下，租金也有超过2个光洋或不满足2光洋，也有以实物代光洋的。

出租者	承租者	收获量	租额	租额占收获量的百分比
徐阿湛、徐新才父	阿新	7拇	3拇	42.86%
徐清华父	邢阿桂	2拇	1/2拇	25%
王老波父	王大滔合亩	2石	1石	50%
徐新才父，徐阿湛	刘阿才	60籬	25籬	41.67%
徐新东父	刘阿番	14拇	6拇	42.86%
	×甲磊	8石	3石	36.7%
	刘老耽	3拇	1拇11撮	48.61%
	×柏青	5拇	2拇	40%
	王柏鲁	2拇	21拇	43.7%

五、借 貸

借贷关系不仅发生在杞黎与僂黎之间，亦发生在不同村的合亩之间、同村的合亩之间、甚至在合亩内部。

(一) 杞黎与僂黎之间：向僂黎借牛，不论时间长短，每年每头牛须付利息1石5斗谷子。向僂黎借粮，利息加倍。今年借1石，明年还2石，第三年还4石，余类推。没有人向僂黎借过钱。

(二) 不同村合亩之间：向不同村合亩之间借牛，在3年内归还者不取利息。3年以后，则每头牛需付利息一拇谷子。不同村合亩之间借粮，利息逐年加倍。

(三) 同村合亩之间及合亩内部借牛、借钱，借一还一，不论年限。合亩之间借粮利息逐年加倍。

本刊继续降低售价 和迁址启事

(一)

本刊自本年七月号起，曾将每册售价从三角降至二角五分，现决定再次降低售价，自八月号起，每册售价定为二角。凡按以前定价订购本刊者，多余订款，均由当地邮局办理退款手续。敬希读者注意。

(二)

本杂志社地址原设在广州德宣路广东科学馆，现迁至广州越秀北路222号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内。敬希读者、投稿者及有关方面注意，如欲投稿或致函本刊，均请按新址投寄。

理论与实际杂志社启

1958年8月1日

解放前番禺乡什茂等四个村合畝生产資料占有情况表 (附表一)

村別	合名	亩称	户数	耕地总面积	每户平均	一戶所有			二戶所有		三戶所有		全合亩所有		牛只总数	每户平均	一戶所有		二戶所有		三戶所有		全合亩所有					
						水田	旱田	小計	旱田	旱田	水田	旱田	水田	旱田			水田	旱田	水田	旱田	水田	旱田	水田	旱田	水田	旱田	水田	旱田
什茂村	王业范合亩		6	10	1.666			10							3	0.5	水	牛	1	牛	1	水	牛	1	水	牛	1	
	王記現合亩		6	23.4	4.734		2.4	16							9	1.5	水	牛	1	牛	1	水	牛	1	水	牛	1	
	王德球父合亩		4	44	11			44							7	1.75												
	王老在父合亩		7	42.4	6.06		2.4	40							12	1.71												
	王如清合亩		6	92.4	15.394	89.1		9.5							15	2.5												
	王友联父合亩		8	28	4.74	2		25.5							34	0.375												
	王老印父合亩		9	30.4	3.22			16.4		14					6	0.67												
	王业公单户		1	3	3		1																					
	合計			47	297.2	6.32	87.1	5.8	92.8	14	14	0.5	10	161.2	58	1.17	15	1	1	1	1	3	1	4	35			35
万板村	徐柏磊合亩		5	27.4	5.48		27.4	27.4						4	0.8													
	徐新才父合亩		6	48.7	8.116		30	30	18.7					10	1.67													
	徐新东父合亩		3	106.5	10.834		63.8	63.8	42.7					31	3.44	10	10	20	6	5	11							
	合計		20	182.6	9.13		121.2	121.2	61.4					45	2.25	21	10	31	6	14								
	張业八父合亩		5	25.8	5.16		20.4	20.4	25.8						3	0.34												
空透村	張儒竟父合亩		9	42.2	4.69		40.7	42.2						3	0.34													
	張业文父合亩		8	22.1	2.762		20.5	22.1						3	0.13													
	合計		22	90.1	4.44		81.6	90.1						3	0.13													
	王老波父合亩		5	82.4	16.28		15.4	15.4			27		40	27	5.4	14	8	24									3	
	王大滔合亩		7	24.1	3.54								24.8	3	0.42	2	2										1	
抱隆村	王明草父合亩		4	18	4.5							18	8	2													1	
	王興福父合亩		9	60	6.66		20	20				40	7	0.78	2	8										5		
	王明章父合亩		3	22.6	7.6		22.8	22.8					40	1	0.34	1	1									2		
	合計		28	208	7.42		58.2	58.2			27		122.8	46	1.642	21	12	3								11		
	總計		117	759.3	6.49	95.6	266.8	362.4	75.4	75.4	27.5	10	284	149	1.27	57	24	81	8	16	3	1	4	4	4	2		

① 王业范合亩另租一头水牛。

② 王如清另有馬五匹。

③ 王友联合亩租三头水牛。

④ 老印合亩有 8.6 亩田是五戶所有。

⑤ 張业八合亩租水牛二头黄牛一头。

⑥ 張儒竟父合亩租水牛七头。

⑦ 張业文父合亩租水牛三头。

資料来源：逐亩調查所得 調查日期：1957年7月 附注：耕地以亩为单位

解放后番陽乡什茂等四个村合畝生产資料占有情况表(附表二)

村別	合名	面称	耕地总面积	戶数	每戶平均	一戶所有			二戶所有			三戶所有			四戶所有			全合畝所有			牛只总数	每戶平均			一戶所有 水牛計	二戶所有 水牛計	三戶所有 水牛計	全合畝所有 水牛計	小黃牛計	黃牛計	小黃牛計	全合畝所有 黃牛計
						水田	旱田	小計	水田	旱田	小計	水田	旱田	小計	水田	旱田	小計	水田	旱田	小計		水田	旱田	小計								
什茂村	王业范合畝	15.1	6	2.534		5.2	5.2														7	1.167		7								
	王記現合畝	28.4	6	4.734		2.4	2.4														12	2	3	7					9			
	王业农合畝	16	4	4																	6	1.25	1	1					4			
	王老立合畝	31.2	5	6.24		2.4	2.4														6	1.2							6			
	王业翁合畝	7.8	6	1.3	1.8	6	7.8														1	0.167						1	1			
	王业拖合畝	19.2	4	4.8								0.5	0.5								6	1.5	4	4					2			
	王福林合畝	22	6	3.66																	2	0.33							2			
王老印合畝	16.4	7	2.34			3.4	3.4													5	0.71							5				
王业公单干戶	5.4	1	5.4			2	2													2	2	2						2				
合計	161.6	45	3.58	3.8	19.4	23.2				0.5	0.5									46	1.02	10	10	10	8	1	4	6	26			
万板村	徐柏磊合畝	35.6	5	7.12		35.6	35.6													10	2	8	4					6				
	徐阿漢合畝	54.7	8	6.988		36	36	18.7	18.7											13	1.625	12	12	1				1				
	徐春平合畝	54.3	9	5.88		12.2	12.2	29.8	29.8				12.5	12.5						12	1.33	12	12									
	合計	145.2	22	6.862		83.8	83.8	48.5	48.5				12.9	12.9						35	1.59	27	128	1				1	6			
空透村	張業八合畝	31.8	6	5.3		5.4	26.4	31.8												5	0.883	5	5									
	張儒亮合畝	31.7	6	5.282		1.5	30.2	31.7												9	1.5	6	6					1	1			
	張業奋合畝	28.6	10	2.86		28.6	28.6													11	1.1	1	1	10				1	1			
	張業文合畝	34.7	6	5.78		5.2	28.5	34.7												10	1.67	1	2	4	4							
	合計	126.8	28	4.52		12.1	114.7	126.8												35	1.25	22	325	1				1	1			
抱隆村	王柏比合畝	26.2	5	5.24		26.2	26.2													5	1	5	5									
	王老挖合畝	24	7	3.42																8	1.14	4	4									
	王大稻合畝	22.2	7	3.16		13.4	13.4													4	0.57	4	4									
	王老兰合畝	22	5	4.4		6	6													8	1.6	1	1	6					12			
	王老易合畝	21	5	4.2																13	2.6	1	1	1								
	王老万合畝	30	7	4.28																5	0.71	5	5									
	合計	145.4	35	4.155		45.6	45.6													43	1.228	28	3	1					12			
總計	579	130	4.45	15.9	263.5	279.4	48.5	48.5	0.5	0.5			12.5	12.5					159	1.228	187	7	194	18	8	1	39	39				

① 王記現合畝另与亞翁合有黃牛一只。
 ② 徐柏磊合畝另有一头与外村合有。
 ③ 王老万另有一条与他合畝合有。
 ④ 王柏比合畝的老牛另有一头水牛与他合畝合有。
 ⑤ 王老挖另有一头牛与他合畝合有。
 ⑥ 王老兰另有一条牛与他合畝合有。

資料来源: 逐畝調查所得, 調查日期: 1957年7月 附注: 耕地以畝为單位

番陽乡什茂、抱隆、万板、空透四个村农具統計表 (附表三)

村名	亩数	户数	解 放 前										解 放 后											
			解 放					原 有					政 府 救 濟					政 府 救 濟						
			铁犁	铁锄	铁镰	钩刀	铁耙	木耙	手捻刀	镰刀	铁犁	铁锄	铁镰	钩刀	铁耙	木耙	手捻小刀	中耕器	铁犁	铁锄	铁镰	钩刀	铁耙	手捻刀
什茂村	8	43	25	27	19	53	0	32	40	0	37	39	66	4	34	43	0	25	23	18	1	2	2	0
万板村	6	36	31	37	39	40	0	34	41	0	34	44	50	6	28	60	0	23	22	0	9	0	0	0
空透村	3	36	16	14	21	43	0	16	18	0	24	31	58	5	19	44	3	6	13	14	10	4	0	1
抱隆村	4	29	13	20	35	26	0	15	0	26	18	43	37		28	26	0	17	8	16	1	3	0	0
合 計	21	144	85	98	114	162	0	97	99	26	124	113	211	15	109	147	3	81	66	48	21	9	2	1

資料来源: 逐戶調查所得

調查日期: 1957年5月

番陽乡什茂、抱隆、万板、空透四个村副业工具統計表 (附表四)

村名	解 放 前										解 放 后														
	狩 猎					手 工 业					手 工 业					捕 魚									
	粉枪	鏢枪	弓箭	尖刀	斧头	纺织	普	木铁	捕魚	粉枪	鏢枪	弓箭	尖刀	斧头	纺织	普	捕魚	粉枪	鏢枪	弓箭	尖刀	斧头	纺织	普	捕魚
什茂村	17	3	6	16	4	40	4		6								6	22	3	14	19	19	46	9	12
万板村	12	7	10			17	6		10								10	11	2	9			25	6	14
空透村	1	3	23	5		26			5								5	11	4	25	6		28		9
抱隆村	10	22	23		5	31	8	18										17	25	25		10	34	7	
合 計	40	35	52	21	9	114	18	18	21	61	34	73	25	29	133	22	35	61	34	73	25	29	133	22	35

資料来源: 逐戶調查所得

調查日期: 1957年5月

稿 約

(一) 本刊欢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投稿。

(二) 本刊特别欢迎下述性质的稿件：

1. 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和社会科学原理闡述我国当前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的重要問題；

2. 批判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理論等方面的研究論文；

3. 通俗闡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基本問題的著作；

4. 华南地区的科学研究資料和学术性調查材料；

5. 国内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評介。

(三) 本刊文字以語体文为主，稿長一般不超过一万字。来稿請用稿紙謄写清楚，并示詳細地址；不拟采用的稿件，負責退还。

(四) 来稿發表后，即奉稿酬。

(五) 来稿請寄：广州市越秀北路 222 号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理論与实践編輯部。

理論与实践

月 刊

1958年第8期(总第8期)

編輯者：理論与实践編委会

广州越秀北路中国科学院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8年8月15日出版

印刷者：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預訂处：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主办

上游

擴 大 征 求 訂 戶

“上游”杂志是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主办的综合性的理论刊物。它的任务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总结广东省实际工作经验和指导广东省的实际工作。每月出版一次，每册定价一角五分。第二期定于九月一日出版。欢迎到当地邮局、发行站订阅。

上游杂志编辑委员会编

上游杂志社出版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发行

訂閱处：全国各地邮局 零售、代訂处：全国各地新华书店